

怎样看待我国高考制度的改革

文 / 刘道玉



刘道玉

刘道玉（1933年11月24日—2025年11月7日），湖北枣阳人，原名刘道雨，字叔嘉，笔名路石，中共党员，金属有机化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武汉大学原校长。

1958年8月，刘道玉从武汉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62年至1963年，在苏联攻读副博士研究生。1963年至1966年，任武汉大学化学系讲师。1966年至1977年，历任武汉大学副教务长、党委副书记。1977年5月，任教育部党组成员、高等教育司司长。1981年8月，任武汉大学校长。1982年，被评为副教授。1985年，晋升为教授。在任期间，武汉大学获得了32项具有国际水平的奖项，授予中国国内首创的有38项，并建立了国家软件工程重点实验室。1988年2月，被免除武汉大学校长职务。2011年4月，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发表致清华大学的公开信——《大学需要有反思精神》。2025年11月7日，在湖北武汉逝世，享年92岁。

刘道玉从事创造教育和高等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在教育部任职期间，为高教战线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很大作用。他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杰出代表，对中国教育创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誉为“武汉大学的蔡元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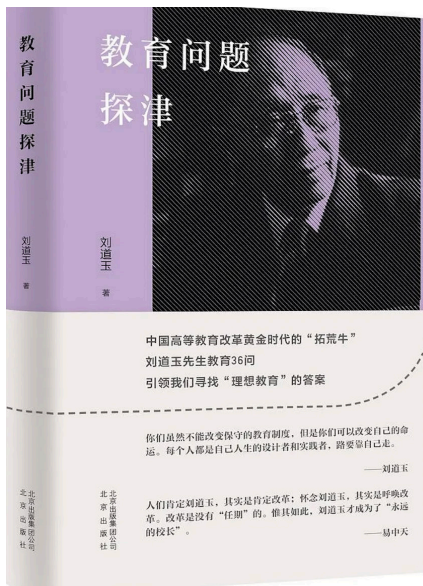
编者按：11月7日，著名教育家、有机化学家，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逝世，享年92岁。刘道玉先生是中国教育的前驱。他在国家教育部任职期间，为高教战线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很大作用。本期推送刘道玉先生关于我国高考制度的改革的旧文，以纪念这位深受敬重的学者和教育家。

怎样看待我国高考制度的改革：仅是刚刚开始

2017年是恢复全国统一高考40周年，厦门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刘海峰教授来函称：“您是恢复高考决策的重要亲历者，希望您为《教育与考试》杂志撰写一篇文章，这对于人们思考和推动大学入学考试改革，将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回答说：“高考改革是全国上下都非常关注的问题，也是一项非常困难的改革任务，我愿意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有所心得，我将写成文章投寄贵刊。”

在恢复高考20周年时，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记者胡维捷和摄影记者刘洪波专程来武汉，于10月10日和11日对我进行了采访，他们后来制作了《鏖金的岁月》（1978—1998）电视片，于11月20日在该台黄金时段播出；同时正式出版了《20年记忆——中国改革开放20年人物志》一书。

为了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2007



刘道玉著《教育问题探津》北京出版社2019年1月

年5月26日，我在北京又接受了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主持人曹景行先生的访谈，该访谈以“1977：亲历恢复高考决策”为题，于6月9日和10日连续播出，后来《新民晚报》又于2007年6月10日和11日分两次全文刊出。《教育与考试》是全国刊载以考试为主的学术刊物之一，我却之不恭，故特回忆恢复全国统一高考的经过，不揣冒昧地对于我国近年高考改革进行评析，并对未来大学入学考试与录取办法，谈谈个人的一孔之见，以抛砖引玉。

恢复全国统一高考的历史功绩

教育是受“文化大革命”破坏的重灾区，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各条战线都面临着拨乱反正的任务，而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尤其艰巨。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华国锋同志还是党中央主席，他提出的“两个凡是”（“两个凡是”是指“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还没有被推翻，教育战线上的“两个基本估计”也仍然起作用，“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和



初中时期的刘道玉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等口号依然充斥在全国各报刊上。在这种情况下，教育战线各基层单位的拨乱反正根本无法进行，渴望中央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澄清诸多是非界限，消除人们心中的“余悸”，否则拨乱反正就无法进行。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奉命被借调到教育部，参加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工作。1977年4月15日，我携带简单的行李到国家教育部报到，在教育部大楼二层一间办公室住下，既是办公室又是卧室，开始了两年“临时工”的生涯。显然，我是抱着临时观点，希望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结束后返回学校重操旧业。可是，我万万没有料到，一个月后中央组织部行文任命我为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司长。

对于这个任命，我丝毫没有思想准备，也不想接受。为此，我专门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向直属机关干部司张长庚司长反映，说我不适合担任教育部的领导工作，更何况我的党员组织关系、工资关系和家眷都在武汉大学，怎么可以任命我担任教育部的领导职务呢？他回答说：“这些关系不在北京并不影响对你的任命，随后把这些关系和家眷迁来北



刘道玉高中毕业照

京就是了。”我无可奈何，只得心不情愿地顾全大局，并开始履行艰巨的拨乱反正工作。

面临着百废待举的局面，拨乱反正从哪里入手呢？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于是我把高教司的改革与筹备全教会结合起来，先后到辽宁、天津和北京郊县做调查。在顺义县调查时，该县管教育的革命委员会姜副主任的讲话，让我受到震撼，他说：“虽然大学恢复招生了，但按照‘十六字’招生方针，工农子弟仍然得不到上大学的机会，其实就是四个字‘领导批准’。这是以权谋私的方针，走后门的方针。我们要求恢复“文革”前的统一高考，农民子女不怕考，你们查一查“文革”以前上大学的还是工农子女占多数。”他的一席话启发了我，再联想到现在的工农兵大学生，他们文化程度差异悬殊，不恢复统一高考，就无法保证教学质量，这使我看到了高等教育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我履职3个月后，正好邓小平同志也恢复了工作，他主动请缨，请求中央指派他抓教育和科学这两个重灾区的工作。大概是7月底，教育部得到通知，说邓小平将召开一个教育和科学的座谈

会，要教育部和科学院各挑选15名学者参加会议。教育部党组指派我负责挑选和通知赴会人员。

我与高教司吴镇柔处长商量确定了16个专家，以老年为主，也有中青年的代表。他们是：北京大学的周培源、沈克琦，清华大学的潘际鑫、何东昌，复旦大学的苏步青，南开大学的杨石先，天津大学的史绍熙，吉林大学的唐敖庆，南京大学的苗永宽，武汉大学的查全性，上海交大的吴建中，西安交大的程道晋，北京农业大学的沈其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温元凯，中山医学院的宗永生，中国医学科学院的黄家泗。中国科学院也选派了17位专家，总共33人参加会议。我与科学院的吴明瑜同志被委任为会议的秘书长，分别负责会议代表的食宿与会务工作。会议代表下榻在北京饭店，会议是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举行，晚上大都安排了文化娱乐活动。

会议代表于8月3日报到，座谈会于8月4日正式开始，除了与会代表外，方毅副总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昌，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常务副部长雍文涛等部门的领导人也参加了会议，总共约70人。座谈会由邓小平亲自主持，在他的启发下，代表们解放思想，发言踊跃，内容广泛地涉及如何看待17年的“黑线专政”、恢复国家科委、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归还被查封的文物和书稿等。在代表发言过程中，邓小平多有插话，会议有议有决，开得生动活泼。

三天很快过去了，来自武汉大学的代表查全性一直没有发言，5日晚他找到我说：“会议开了几天，听了其他人的发言很受启发，我本想讲的，别人都讲了，你看我讲点什么好？”我说：“你来得正好，我原打算把推翻‘十六字’招生方针作为高等教育拨乱反正的突破口。”于是，我向这位代表建议，希望他明天发言就讲这个问题。他说：“是

呀，大家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这的确是一个重要问题，我明天就提出恢复全国统一高考问题。”他当晚做了认真准备，8月6日上午他就这个问题慷慨陈词，得到了汪猷、吴文俊、王大珩等代表的支持，最后邓小平充分肯定了他的发言。本来，当年的招生工作会议早在7月5日在太原已经开过了，但邓小平说：“看准了的，就马上改，开过了招生会议，重新再开一次就是了。”

就这样，由邓小平同志一锤定音，一举推翻了“十六字”招生方针，同时也恢复了“文革”前实行的全国统一高考招生制度。8月13日到9月25日，在北京又紧急召开当年的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争议很大，意见难于统一，又开创了长达44天的会议记录。在会议争执不下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又亲自找教育部刘西尧、雍文涛、李琦谈话，严肃指出：“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跟着我犯错误。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抓，招生会议尽快结束。”经邓小平再一次拍板，招生工作会议结束了，并正式启动了恢复全国统一高考的命题、统考与招生工作，从而揭开了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第一个战役的序幕。

从以上的经过说明，推翻“十六字”招生方针和恢复统一高考，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但是，这项重大拨乱反正的举措却得到了全社会的拥护，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尽管恢复高考时间紧迫，但是1977级和1978级的考试与录取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虽然恢复统一高考既不是改革，也不是创新，但它在特殊时期，却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可以说是功在当代，而利在千秋啊！

在我看来，恢复全国统一高考的意义主要表现在：第一，有力地推动了拨乱反正，为十七年教育战线恢复了名

誉，是推翻“两个凡是”的前奏。众所周知，“两个凡是”和“两个基本估计”就像两个紧箍咒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尤其是被斥之为“臭老九”的广大的知识分子。既然毛主席圈阅的“两个基本估计”被推翻了，人们质疑“两个凡是”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果然，9个月以后，也就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从而导致了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它是五四运动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扫清了思想障碍。时隔1年零7个月，也就是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才正式决定，撤销毛泽东圈阅的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这就充分说明恢复全国统一高考是超前的，中央也顺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

其次，解放了大批农村知识青年，尤其是出身不好所谓的“可以教育好”的知识青年。从1967年到1977年，全国下放的知识青年多达1600多万，从1970年开始以招工、病残和独生子女的形式，差不多有半数的知识青年回到了城市。到1977年，仍然有800多万知青滞留农村，而大部分是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他们是招工回城无望的群体。真是天赐良机，全国统一高考恢复了，他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机遇给他们带来了命运的转机。

虽然恢复高考的第二次招生会议争论非常激烈，但最后的招生文件却十分开明，报名考生的出身、婚否和年龄都没有限制，这就为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1977年报名考生570万，录取了27.8万；1978年，报名610万，录取40.2万；1979年，报名460万，录取28万。在这三届中，由知青考取的大学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们渴望知识、有理想、有抱负，从他们之中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的人才，成为政界、学



1962年8月,刘道玉(右一)在苏联列宁格勒(俄罗斯城市圣彼得堡前)



1981年,刘道玉迎接新生

术界、企业界的中坚力量。我在20世纪80年代说过一句话：“这三届学生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将来也一定会担当大任。”

再次，极大地扭转了学校的风气，进而带动了社会风气的转变。在“文化大革命”中，学生中普遍流行着“读书无用”的论调，曾经出现过“白卷英雄”“不懂ABC照样干革命”等反面的典型。在教师中也流行着“教书倒霉”“理论危险”，一些留学苏联的副博士将证书烧毁，以示与资产阶级划清界限；也有不少教师把书籍当废纸卖掉，以表示永不再当教师的决心。

凡此种思想，既不符合国家建设“四化”的需要，也违背了时代精神。要纠正这些错误思想，马克思曾说过：“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而推翻“两个基本估计”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行动，它与恢复统一高考是因果关系。它们表明文化革命一去不复返了，知识分子不再是“臭老九”，而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建设现代化的依靠力量。这个行动使学校读书蔚然成风，争当科学家重新成了广大青少年的美好理想。同时，恢复高考又极大地带动了社会风气的转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了全社会的时尚，那种诋毁知识和鄙夷知识分子的邪气也一扫而光！

对我国近年高考改革的冷思考

在特殊历史时期，恢复全国统一高考，曾经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个举措既非改革又不是创新，仅仅是恢复了“文革”以前的大学的考试与招生制度而已。因此，我们不应当故步自封，也没有必要以功臣自居。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幅员辽阔，各地区的经济、教育和文化差异极大，于是统一高考的各种弊端也逐步暴露了出来。

主要表现为：一是一次考试定终身，使不少人失去了二次选择的机会，不免留下终身的悔恨。二是完全以分数高低录取，既强化了应试教育，又扼杀了许多人的创造能力。三是忽视了各地区教育水平差距，出现了高考移民，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助长了不正之风。四是各种巧立名目的加分，乱象丛生，权与分的交易，如北京大学在北京市录取的学生，40%都是加分投档的。五是学生负担重，以至于在备战高考时出现了“吊瓶班”“赤膊班”，带着吊针进考场，使相当多考生的身心受到摧残。六是不同水准的大学，用一张试卷，难以适应不同水准大学录取学生的需要。七是大学在各省市的招生数额，完全由教育部分配，这就造成了招生中的“马太效应”，北京市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甚至引起了各省市的公愤。有鉴于此，全国上下对高考改革议论纷纷，强烈要求改革统一高考与招生制度。

为了顺应民众的要求，大约从1998年开始，教育部先是推出了“3+2”，后又演化为“3+X”高考改革方案。所谓“3”是指语文、数学、英语三门课程，它们是我国基础教育历来所强调的主课；而X=1、2、3，是指物理、化学、生物或政治、历史、地理等六门课程，文理科不同的考生可以任选，有关省市也有一定的机动性。教育部于1999年先在广东省试点，到2001年又在北京等十个省市扩大试点，至2002年在全国普遍实行。

应当说，“3+X”高考改革方案的出发点是好的，目的在于使大学能够选拔优秀的人才，也有助于中学推行素质教育。但是，这些良好的愿望并没有体现出来，每年的高考依然使广大考生闻风丧胆。在我看来，“3+X”高考方案仍然没有走出单纯考知识的窠臼，也没有能够减轻考生的负担。其实，这是一种玩积木式的考试改革游戏，虽然有加有减，但并没有改变游戏的规则，而且“X”变成了一个“大箩筐”，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不仅不便操作，而且也造成了某些混乱。

扩大大学自主办学权，一直是各大

学强烈的要求，在千呼万唤的情况下，国家教育部终于在2003年，出台了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自主权的试点方案。当年经教育部批准试点的大学只有22所，自主招生的人数仅占该校招生总数的5%，申请的学生必须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分数达到生源所在省市确定的与试点学校同批次控制分数线，申请的学生可以享受降低10到60分录取。至今，这个改革方案已经实行了13年，2017年试点大学将扩大到90所，而且又出现了普通自招、特色自招等多样化的形式。但是，经过十多年的试点，始终褒贬不一，质疑与争议之声不绝于耳，甚至不少学者发出感叹：“自主招生究竟何去何从？”

2009年10月，北京大学又推出了“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此举刚一公布，立即遭到教育界的质疑。他们纷纷指出，这是一个噱头，是北京大学抢夺优质生源的借口，是挂羊头卖狗肉。这个措施一抛出，我就通过媒体指出：“校长实名推荐制”不是改革举措，过去一直也有这种推荐的办法。但是，北京大学把这种办法提到改革的高度，不仅令人愕然，而且存在诸多不公平的隐患。被指定的有推荐权的39所高中，相对于15681所普通高中来说，后者显然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照理说班主任、任课教师和教务主任更了解学生的真实情况，但他们却没有推荐权，显然也是不公平。在一片质疑声中，教育部却鼓励北京大学试行推荐制。然而，我认为强行推行，肯定是要失败的，现在不是已经销声匿迹了吗？

据报道，2010年11月20日，清华大学率先成立了7校高考联盟，打出的招牌也是扩大招生自主权，这些大学是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清华大学是要占山为王，它不与

一路之隔的北京大学搞联合，就是要争老大的地位。然而，北京大学也不甘示弱，时隔一天也宣布成立7校联盟，它们是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香港大学，后来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也纷纷加入，于是组成了13校联盟与之抗衡。教育界诙谐地戏称前者是“华约”，后者为“北约”。

没有加入这两个联盟的大学，生怕自己被边缘化，于是由上海同济大学倡导成立了“卓越联盟”，它们是同济大学、东南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天津大学、重庆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9所大学。那一阵子，人心惶惶，不去分辨是非，追问这些联盟是否符合教育规律，而是盲目地跟风，媒体一时也难于判断是与非。

这年12月10日，我接到山东《大众日报》记者逢春阶的电话，他说希望到武汉对我进行采访，我以身体欠佳婉拒了。他随后又发来短信写道：“最近大学招生联盟搞得很热闹，我社总编辑指示我们说，武汉大学刘校长是敢于说真话的人，他头脑清醒，看问题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你们就高考联盟问题去听听他是什么看法。”虽然我并没有答应他们来采访，可是逢春阶等二人已经买好了机票。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办法再拒绝他们，否则太不合人情了。

12日上午，我约请他们在家中交谈，就高考联盟、大学扩招、大学办分校等问题谈了一个半小时。我明确地表示：“我不赞成‘华约’和‘北约’，他们的目的是掐尖，但招收尖子人才靠智慧，他们有智慧吗？我断定高考联盟搞不下去，注定以失败而告终，因为烦琐哲学必定遭到唾弃。”果然不出所料，鉴于大学招考联盟的恶性竞争，同

时也增加了考生和大学的负担，教育部于2015年宣布解散全国的各种大学招考联盟，这是顺应了民心的要求。

2014年9月3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浙江和上海闻风而动，抱着“先改革先受益”的理念，于9月下旬公布了《考试招生综合改革方案》，由此又拉开了我国新一轮高考改革的大幕。据介绍，浙江的高考综合改革方案，大致包括以下几点核心内容：一是正式高考只考语文和数学两科，每科最高为180分；二是英语既不参加统一高考，也不参加学业水平考试，而是参加每年两次的社会考试，取最高分纳入高考总成绩；三是不再分文理科考试，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也不参加统一高考，而参加一年多次的学业水平考试，取三科成绩乘以0.8，最高为240分。据浙江有关部门报道，试点进行顺利，平稳推进，有些方面初见成效。但是，这项试点从一开始就有争议，也有评论认为是改革的闹剧。此外，高考改革的方案层出不穷，如广东版、北京版、辽宁版，让人们目不暇接。

综上所述，近20年的高考改革是极其不平静的，大有八仙过海之势。但总的说来，并没有走出困境。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的问题：首先，从指导思想上看依然是把高考当作指挥棒，如语文和数学的分值又从150分提高到180分，生怕学生不重视，而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等课程的学习，也把它们列为每年两次的学业水平考试。

总的说来，与国外和民国时期的高考相比，现在的考试科目太多，考试太频繁，学生负担太重。其次是依然是考试知识，没有走出按分数高低录取学生的窠臼，并没有淡化中学的应试教育。三是自主招生没获得突破，是否享有自主招生权和自主招生的比例仍



1983年武汉大学秋季开学，校长刘道玉在校园里征求学生对办学的意见



1985年获颁法国总统密特朗勋章

1985年,获颁法国总统密特朗勋章

然牢牢地被教育部所控制。究其原因，主要是高考改革的指导思想不解放，认为考试科目越多和考试越严格，就越有利于选拔人才。其实，恰恰相反，我国之所以出不了杰出人才，就是因为频繁的考试把学生考傻了，窒息了他们的好奇心、想象力和创造力。

大学招生要重录而不重考

我国大学招生考试的路在何方？对此，人们议论纷纷，甚至有人认为我国高考改革是一个无力和无解的问题。我认为，悲观是毫无道理的，只要我们端正高考改革的指导思想，遵循教育规律，顺应民心，一定能够制定一套相对公平、合理和简化的高考方案，并且以立法形式长期固定下来，决不能再朝令夕改，也不能再搞那些劳民伤财花里胡哨的改革方案了。我国高教界，总有那么一些好事者，他们也是打着改革的旗号，提出一些烦琐的招考方案，其实只不过是瞎折腾而已。我国大学不能再折腾了，需要稳定和宁静的环境，以专心致志地做学问。

对我国高考改革，我始终是关注的，但过去却很少发声，原因是这个问题既复杂又太敏感。但是，经过近20年多方面的尝试，现在似乎能够看出端倪了。因此，国家教育主管领导部门，应

当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集中群众的智慧，制定相对公平合理的高考改革方案。我愿借此机会，抛一孔之见，以求教于教育界同人。

我认为比较明确的有以下几点：

1. 实践证明，全国统一高考是相对公平、公正和合理的方案，相对地说考试成本低，考生负担轻。作为改进的是，每年春（3月）夏（6月）各考试一次，每次成绩具有同等的效力。此外，任何单独考试、各种名目的联考、社会考试、学业水平考试都是不必要的，因为无法证明它们比全国统一考试更高明。在高考问题上，一定要去繁就简，简单就是美，简单最真实，简单容易操作。

2. 全国高中取消文理分科教学，高考取消文理分科考试，以彻底消除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单纯追求升学率造成的弊端。从人才成长规律看，青少年应当坚持全面发展、文理兼备，试问：一个科盲怎么能够成为哲学家呢？同样的，没有良好的人文素质，也是不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自然科学家或工程师的。至于极个别的偏科且有特长的考生，通过面试考核，以自主特招的方式来解决。

3. 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英语和综合素质，考试日期为两天。我坚决主张把英语纳入全国统考的科目，理由

是基于三点：一是中国人的英语普及水平，不仅在世界无可比性，而且在亚洲也是最差的国家；二是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与思维方式有密切关系，提高英语水平有利于学习借鉴欧美国家的思维习惯，有助于国人从模仿思维向创造思维转变；三是40年高考的经验证明，把英语纳入高考是必要的，我国国民英语水平有所提高，与把英语纳入统考有密切的关系。

综合素质不仅包括“3+X”中的“X”涵盖的6门课程有关知识，而且还包括好奇心、联想力、悟性、竞争与合作意识等。也许，有人说这样一来，将会导致学生不认真学习“X”包含的课程了。我不赞成把考试当作指挥棒，其实“X”包括的那些课程，只要有高小文化程度的人，都是可以自学的。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学校里学习的课程，在以后的工作中都是用不上的，既然没有用，又为何要耗费精力呢？

4. 大学招生中的不公平，一直是备受诟病的问题。这些不公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部直属大学在学校所在地与外地，尤其是在边缘省份的招生名额分配不公。我国有18个省市拥有985工程的大学，北京有8所，7个省市只有1所，而居然有13个省、自治区没有1所985工程大学。我把这个不公称为招生

中的“马太效应”。例如，2005年北京985工程大学在北京招生的比例高达50%，这样一来北京的考生400多分就能被录取，而外省市的考生600多分尚进不了北京大学。另一个问题是城市与农村考生之间的不公平，以至于全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越来越少。

解决的办法是，把985工程大学所在省市招生比例控制在20%，80%的招生人数分配给外省，名额按各省应届毕业生的人数按比例分配。至于城乡考生不公的问题，已经引起了某些大学的重视，解决的办法是各校拿出一定的名额，以特招的方式向农村考生倾斜。当然，这些都是权宜之计，最根本的还是加大对边缘省市的教育投资，支援优秀教师，着力建设当地高水平的大学。

从制度上来说，我建议大学招考实行三权分立制度，相互制约与相互促进。我所说的“三权”是考试权、录取权和监督权。

首先是考试权。国家组建独立（不隶属于教育部）的考试院，它作为公益性的服务机构，对全国负责。该院组建一支教学水平高、秉公办事和有敬业精神的专业考试队伍。他们负责调查研究，科学地设计与高中教学水平相符的考题，并建立试题库。他们的职责是：组织每年的两次高考、阅卷、评分；向考生颁发考试成绩证书；向教育部通报全国全部考生的成绩；向各省市教育局通报该省市考生的成绩；向各大学分别通报相应有关考生的成绩等。

其次是录取权。各大学拥有完全独立的自主录取学生的权力，既不需要教育部批准，也不再受教育部划定的录取比例的限制。每所大学有权根据本校招生的人数，根据国家考试院提供的信息，划定本校的录取分数线，以及特招和加分的政策。各大学组建精干的招生班子，招生干部要有辨别人才的智慧。铁面无私、秉公

办事，敢于抵制招生中的任何不良行为。招生工作人员相对稳定，收集和 design 面试的题目，建立面试的题库，组织好每一年的招生面试工作。

再次是监督和稽查权。从宏观管理来看，教育部本来应当是监督教育公平和稽查教育腐败。因此，建议由教育部和国家监察部联合组建高考与招生督查委员会，专门受理高考和招生中舞弊和权力寻租的事件，制定最严格的惩处条例，关于高考和招生中的任何行贿、受贿、拉关系、走后门和不当加分等腐败行为，做到一次见光死的惩处。而且，国家稽查委员会对各大学加分特招的学生，建立专门档案，跟踪调查，如果三年以后不能证明其当初加分的理由，要追究当初批准加分者的责任。我国大学教与学及其有关的人数，可能占到全国人口的1/10，我相信从高考和招生的腐败抓起，将有助于扭转整个社会的风气，重建我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统一高考与大学录取，就其重要性来说，后者永远是最重要的。因为考试是机械的，按照分数高低录取只是加法的运算，而凭智慧辨别人才才是真正的选才之道。在这方面，美国常春藤大学的招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这些世界一流大学，每年有100人左右的专业的招生人员，他们训练有素，深谙辨别人才之道。他们的工作不仅限于短短的招生期间，而是要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考查学生。在面试时，平均每个学生要面试一个小时。那么，他们在面试时，都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在面试中面试官会发现你陈述的破绽，会试探学生知错认错的诚信，也许会测试你随机应变的悟性，等等。

我们应当看到，在招生中的公平与公正都是相对的。不久前，美国斯坦福大学招生官理查德·肖（Richard H. Shaw）回答：招生究竟看重什么？是考

试成绩，是性格，是课外奖项，是多才多艺的证明？他在给被拒学生的公开信中说：“首先，一切都是相对的。”他举了一个例子，1975年加州Sunnyvale的一名叫安德鲁·菲尔（Andrew Fire，1959—）的学生被拒，他有些沮丧，但他后来被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毕业后他到MIT获得博士学位，最后成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因为发现了控制基因信息流动的基本机制，与克雷格·梅洛（Craig C.Mello）共同获得了2006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为此，他告诫学生：“真正能够影响我们一生的，并不是你在哪里上的大学，而是你在那里学到了什么，以及你与他人的与众不同之处。”

美国常春藤大学都拥有悠久的历史，他们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招生与录取制度，既然他们都认为公平是相对的，何况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呢？所以，我们应当认识到没有十全十美的高考方案，考试与录取中的公平、公正、合理也都是相对的。问题的关键是要杜绝高考与招生中的各种腐败现象。大学应当是圣洁之地，要荡涤一切污秽龌龊的现象，建设精神文明的高地。

同时，学生以及他们的家长，都要树立正确的教育价值观，少一些虚荣心，力戒功利主义，淡化名校情结，走出专业选择的误区。我们一定要看得长远一些，从中学到大学仅仅是人生的一个驿站，人生的道路还很长。无数的事例都说明，名校和名师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成功与否。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设计者、承担者和主宰者，只要沿着自己的理想执着不懈地追求，即使没有大学的学历和学位，只要修炼出了灵性和悟性，把握住了创业的灵感和机遇，他们也是能够获得成功的！

（本文选自北京出版社2019年1月刘道玉著《教育问题探津》）

刘道玉：实为道玉，甘做路石

文 / 若 愚

90岁的刘道玉一直住在武汉大学一座不起眼的家属楼里，他听力很差，视力很差，右手也无法写字了，但仍心系教育改革。刘道玉被称为“武大蔡元培”。1980年代，在武大校长任上，他一方面营造了自由开放的校风，另一方面大刀阔斧改革现代高校的教育制度和管理模式。

从教改实验的拓荒者，到今天高教改革的呐喊人，刘道玉背负着梦想，在一路坎坷跌撞中勇毅前行。

靠假身份“跳考”

1933年，刘道玉出生于湖北枣阳的一个村庄。当时家庭条件比较差，父母没办法同时承担3个孩子的上学费用，因此他直到8岁的时候，才跟他5岁的二哥，一起进了村里的私塾接受启蒙教育。比起官办的小学，私塾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和灵活性，农闲开馆、农忙放假，每年上学的时间大抵只有4个月，不影响他们帮家里干活。

给他们教书的是翟秀才，要求极为严厉，每天都要学生背诵《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书，一旦背错，轻则罚站，重则用戒尺打手心、用竹根打脑袋瓜儿。虽然刘道玉背得不错，很少挨打，但是他对这种棍棒教育却十分反感，认为棍棒触痛的往往只是肌肤，伤害的却是心灵，起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且是短暂的，还让师生产生了对立仇恨情绪。由此，刘道玉在一生的教育生涯中，大力倡导博爱教育，不遗余力地呼吁废除一切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惩罚主义教育。

3年后，大哥参加了工作，家庭条件有了改观，刘道玉和二哥转到了当地

的中心小学读书，以便接受正规的教育。为了省钱，兄弟俩寄居在学校外的一家油坊，自带米面做饭，晚上就在角落里打地铺，冬天垫上厚厚的稻草防寒。当时学校组织了一次童子军训练，要求花钱定制服装，父母为了省钱，就用土布进行染色，然后再照着制服的样式进行裁剪。兄弟俩得意扬扬地穿着新衣服上训练场，没想到被教官一眼看穿，把他们狠狠羞辱一番，不允许参加训练。回家后，他委屈得直哭，母亲安慰说，要想让人看得起，就要拿出一流的成绩来。他一直记得这句话，每次考试都是班级第一名，让老师和同学们刮目相看。

1947年夏天，二哥小学毕业，但他已经19岁了，被叫回家帮父母干农活。为了省钱，当时还是5年级的刘道玉拿着二哥的毕业证，提前参加了考试。或许是有些心虚，他没有报考枣阳县城的中学，却选择了离家更远的襄阳县二中。幸运的是，“调包计”没有被发现，他以第三名的成绩被顺利录取。

1950年夏天，刘道玉想报考高中，遇到的一个现实难题就是没有毕业证。原来，初中期间经历了襄阳解放、学校停办和复课，他的学习受了耽误，正常的话要到当年冬天才能拿到毕业证。正当他着急时，一个枣阳同乡主动帮忙，用“河南省南阳中学”的名义，给他办了张正规的毕业证。事后很久，那位同乡告诉了他个中的秘密：南阳解放时，南阳中学的校长和部分教师随国民党逃窜了，管教务的是一位枣阳籍先生，他趁机把石印的空白毕业文凭、学校钢印和校长的私章都带回了家，他们的初中毕业文凭就是由这位先生出具的。从性



刘道玉结婚照

质上说，无疑这是一次违法的作弊行为，虽然它满足了刘道玉跳考的欲望，但是当回忆起这桩事时，刘道玉的内心总有一种羞愧之感。

靠着这张毕业证作为敲门砖，刘道玉参加了襄阳高中的入学考试，并被顺利录取。这所学校底蕴深厚，不少老师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才生，有的还曾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在这么多名师的教诲与管理之下，刘道玉的学业有了很大进步。回过头来看，不管是冒充二哥身份报考，还是制作初中毕业的“假文凭”，都是源于一颗追求知识的虔诚之心，都学到了实打实的真知识。

不当部长当校长

1953年，刘道玉考取武汉大学化学系。之所以选择化学，是因为他小时候读过一本关于诺贝尔的书，心中就种下了当化学家的梦想，立志像诺贝尔那样研究科学。入学后，他用心学习钻研，寒暑假都没有回家，英语是用俄文教材来学的，成绩一直出类拔萃。他还参加了抗洪，带病坚守在大堤上。他的毕业论文达到了很高水平，在《武汉大学学报》上发表。

不过，有一样刘道玉算是破了戒。他原本想效仿诺贝尔，终身不结婚，把



刘道玉和孩子们

一切都奉献给化学。怎奈何丘比特之箭实在是难以抵挡，大四时他和同班同学刘高伟走到了一起。正是受这段经历的影响，在他担任校长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学生不准谈恋爱的规定，允许大家跳交谊舞、自由恋爱。

本科毕业后，刘道玉和刘高伟一同留校任教，并于1961年元旦结婚，所谓的婚宴只不过是一碗白萝卜汤。刘道玉师从曾昭抡先生从事化学研究，曾取得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还公派赴苏联留学，成为学界权威克努茨茨门下唯一的中国学生，并担任学生会主席。

1963年，中苏两党发生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论战，刘道玉因为参加论战、反驳苏方的观点，被苏联外交部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被驱逐出境。回国后，陈毅外长亲自到机场迎接。周恩来总理接见了，给予了很好的工作机会供他选择，但他执意要回武大任教。后来，他成为化学系最年轻的讲师，编撰了一本国内还是空白的《有机氟化学》教材。此后，刘道玉一度被委以重任，32岁时就担任了武大副教务长，但也曾受到过审查、经受过冲击，被批斗、劳改过3年时间。刘道玉每次“游街”回来，妻子都会心疼地抱着他痛哭好久，尔后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给他清

洗、敷药、包扎伤口。他们相互鼓励、相互扶持，熬过了那段艰难岁月。

文革结束后，1977年刘道玉被“借用”到教育部，担任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直接筹划和参与了恢复全国统一高考的会议，为高等教育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当所有人都看好刘道玉的发展前景，认为他只要继续干下去，说不定都有希望当上部长时，他却主动提出要回大学去。原来，他认为当校长虽然没有当部长权力大，但是各方面受到的限制更小，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的机会更多，可以扎扎实实地做一番自己想做的事业。

两年之后，刘道玉回到了武大，先后担任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1981年8月21日，刘道玉被任命为武大校长。翌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国务院对他的任命，并说刘道玉“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刘道玉回家告诉妻子这个任命，妻子开口就说：“绝对不能干，宁愿受处分。”她进一步说：“事不宜迟，你到北京向中央申诉理由，说你干不了。”刘道玉觉得她的建议也正是自己想要采取的措施。但木已成舟，最终刘道玉走上了新的岗位，而刘高伟选择

继续支持他的工作。

其实，刘道玉当上校长时，心里也是憋着一股气的，那就是当时的武大，在全国重点大学中排名十分落后。此前，在北京举行了一场23所部直属大学科研成果展览会，刘道玉作为教师代表首批前往参观。他们兴致勃勃地走进展览馆，看到北大、清华、复旦、南开等名校都布置了很大的展厅，展出当时最为先进的研究成果。

大家满怀期待地寻找武大的展厅，却怎么也找不到，最后只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一个像香烟盒大小的空气电池的展品。就在那一瞬间，大家感到无地自容，不约而同地摘下了佩戴的武大红色校徽，就怕有人对他们指指点点，在背后指点嘲笑他们“还有脸来参观”。回到招待所后，大家都觉得丢人，结果晚饭谁也没去吃。在这次科研成果评比中，武大排在23所直属大学的倒数第二名。这一差距让刘道玉刻骨铭心。

履新校长后，刘道玉召开了首届科学研究大会，在会上发出了“卧薪尝胆，十年雪耻”的誓言。实际上，对刘道玉的任用也算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因为刘的职称还只是化学讲师，行政级别是20级，连科级干部都不够格。妻子分析，他赶上了“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浪潮。

当校长一年后，刘道玉被评为化学副教授，1985年晋升为化学教授。尽管校务繁杂，他还是继续深钻化学领域，曾经连续两届当选中国化学理事会理事，发表的论著颇多。但客观来看，校长的工作限制了他对科研的投入。如他所说：“担任校长以后，我就进行了思维的转换，从我自己想成为获诺贝尔奖的发明家，转换成培养更多得到诺贝尔奖的学生。”

但妻子最担心的，是刘道玉“弱不禁风”的身体。他体质较差，患有萎缩性胃炎、胆结石等多种慢性病。对于他来

说，吃饭可是个“头等难事”，不能吃含有脂肪的食物，就连豆腐也消化不了，只能吃一点蔬菜和鱼。当校长后，搞科研、接见外宾、和学生见面，每天都忙得连轴转，妻子担心他的身体根本扛不住，每次说起来，都会急红了眼眶。

不拘一格求人才

大学之大，首要在于大师。走上校长岗位后，刘道玉感受到人才缺乏的问题十分突出，为了培养人才、争取人才，他想尽了各种办法。

刘道玉首先想到的是发掘学校里的人才。武大藏龙卧虎，有许多非常著名的大家学者，如病毒学家高尚荫、数学家李国平、光电化学家查全性、历史学家唐长孺、吴于廑等，都是泰斗级的人物。刘道玉利用暑假，登门请教过去的学校领导、学术泰斗、各个年龄段的教师，其中也有过去反对他的人，请知名专家出山执教。

法律系曾经是武大的王牌，但在1958年院校调整时合并到外校去了。刘道玉决心恢复法律系，当时留美法学大师韩德培教授因为被打成“右派”，其他学校不要，才留在了武大，也算是因祸得福。刘道玉把韩德培比作“晶核”，调整他的住房，将其女儿调来学校照顾他，亲自跑教育部调升他的工资待遇，极大地调动了老教授的积极性。围绕着这块晶核，很快又凝聚了一大批相关人才，法律系再次成为武大的王牌。

邓晓芒在16岁时到农村插队，虽然生活很辛苦，但他并没有放弃对学术的追求，啃读的是高深的哲学典籍。回城后，他当过临时工和搬运工。1978年，他第一次报考研究生，但因为成分问题没有被录取。第二年，他决定报考武大哲学系的研究生，给陈修斋教授写了一封信，附上了自己的哲学习作。陈教授给他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并提出希望他自学一门外语。只有初中文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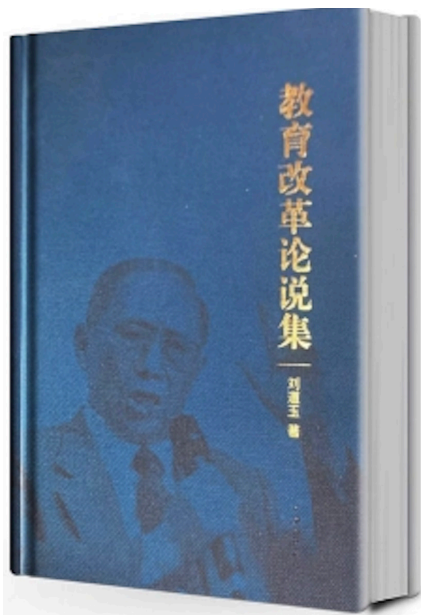
的他，用了一年时间自学了德语，考试时德语成绩超过录取线10分。陈修斋教授对他十分赏识，多次向刘道玉进行引荐。邓晓芒研究生毕业后，被刘道玉破格留校任教。

后来，邓晓芒开创了句读法的讲授方法，就是对康德、黑格尔的经典著作，逐句进行解读，平均每句话解读10句左右。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他在武大整整讲了7年才讲完，没有一个学生完整地听完全部课程。但是对不少学生来说，学习到这种方法，对于阅读哲学典籍是很有帮助的。对于邓晓芒的成就，刘道玉这个伯乐感到很欣慰。

对于一些有争议的人物，刘道玉也敢放开手脚使用。有一个叫杨小凯的人，只读过高一，因为一篇万字长文而入狱10年，却在狱中自学文化，继续钻研经济学。出狱后，没有人敢用他，只在一家印刷厂找到了当校对的差事。杨小凯曾报考中国社科院，因为“历史问题”的包袱，他的户口无法进京，只能当实习研究员。刘道玉认可并惊叹他自学和研究的成果，于是把他调到了武大，还给他妻女都解决了户口。为了让其安心工作，刘道玉又请湖北省委将杨小凯及其父母的“历史问题”彻底平反。一年后，刘道玉专程到北京疏通，给杨小凯评了讲师，谱写了高中生当名校老师的传奇。

刘道玉赞赏人才，却不搞桎梏人才那一套。当杨小凯在武大取得一系列成果、引起国际学术界关注之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向他发来了前往攻读博士学位的邀请。但由于其“历史问题”，杨小凯出国被卡住了。刘道玉又是专程请人协调，甚至给有关领导写信，这才让杨小凯顺利出国。

刘道玉与杨小凯一直保持联系，互相引为骄傲。他们约定，只要刘道玉身为校长，杨小凯学成之后就一定回到武大来任职。2004年，杨小凯因癌症英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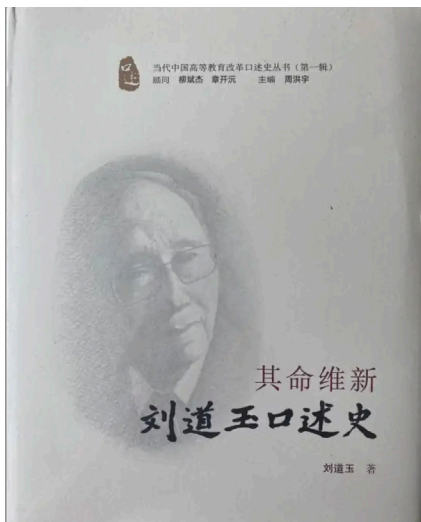
《教育改革论说集》是由教育家刘道玉撰写、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学术著作，收录作者三十余年教育改革实践经验与理论思考。该书以1985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论述纲要，系统阐述提高民族素质与人才培养质量的教育改革目标，整合古今中外教育案例进行论证。文字风格朴实流畅，兼具学术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

早逝，最终没能回到武大。而这一段经历，刘道玉写了万字长文，收录在自己的回忆录里。

知名学者易中天，也是武大的学生。易中天曾在新疆任教13年，研究生考试恢复后，他报考了武大中文系的研究生，师从胡国瑞先生。易中天属于代培生，按照规定必须回生源地新疆工作，胡国瑞舍不得人才，于是找刘道玉请求帮助：“他是我一生培养的唯一文艺美学研究生，我现在是古稀之年，后继乏人，需要学校把他留下来。”

刘道玉十分尊重胡国瑞的意见，为了留下易中天，向新疆额外增加了5个本科毕业生的分配名额。这样的交换，现在说起来似乎轻描淡写，但在20世纪80年代还是难度很大的，这也得益于刘道玉曾经在教育部任职，上下的关系较为熟悉。

易中天记得1982年时，他第一次去刘校长家，看到他住的是最普通的公寓



《刘道玉口述史》由刘道玉撰写，2021年6月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口述形式记录作者1981至1988年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的教育改革实践，包括首创学分制、主副修制、交叉学科建设等创新举措，并系统阐述其教育理念及未实现的改革规划

房，只有两室一厅。一进门就是客厅，正面是一条简易的旧沙发，摆了几个小板凳。卧室里摆放着普通的棕绷子双人床、旧衣柜和写字台，其他也放不下什么了。易中天很是诧异，校长为什么住这么差。刘道玉说：“只要武大教师的住宿问题没有解决，我刘道玉绝不住大房子。”

刘道玉的陋室，却是学生们欢聚的场所。每天晚上，客厅里门庭若市，一波接着一波的学生等待着上门。当时有篇报告文学，说是学校宣传部部长晚上去找校长汇报工作，发现自己是到访的第16批后，“啊”了一声便告辞。

易中天也不负刘道玉厚望，用诙谐幽默的语言，把枯燥的课本知识讲得妙趣横生，深受学生们的喜爱，被称为“武大四大名嘴”。每次易中天上课，几百个人的大阶梯教室都坐得满满当当，去晚一点都没有座位。但好景不长，随着刘道玉卸任校长，易中天当了多年的讲师、副教授，和妻女一直住在30多平的风房子里，无论是事业还是家庭都十分艰难。后来，他远走厦门大学，并靠着在《百家讲坛》的授课而名满天

下。时至今日，易中天还尊称刘道玉为校长，新书出版都要请刘校长写序，刘道玉撰写的书籍他也会积极推荐。两人之间延续着亦师亦友的特殊情感。

其实，在当时的学术界，还有不少人获得过刘道玉的恩泽。当他们在原单位陷入困境时，刘道玉想方设法把他们调到武大；在他们想出国进修时，刘道玉又以单位名义为他们推荐；在需要家属子女陪读时，刘道玉还冒着很大的风险，先把他们的家属户口落到武大，再迅速办妥相关出国手续。很多人担心送出去的学者不愿意回国，刘道玉却认为，应该相信大部分人都是愿意回来的，而他们那时肯定会学有所成，将为教育和科研带来更大的贡献。

大刀阔斧进行改革

学生是驱动刘道玉改革的最大动力。他一直主张创造教育，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创造活力，培养出更多的创造型人才。1981年武汉大学全面推行学分制后，到1983年暑假，首批共有28名学生提前毕业，大多数只有半年到一年，一个名叫张瀚涛的学生却足足提前了一年半，一举成为“中国当代学分制的第一个受益者”。很多武大学生都立志向张瀚涛学习，努力早日毕业。后来，张瀚涛成为知名计算机教授。武大的学分制一炮打响，这也进一步坚定了刘道玉推进大学改革的决心。

高考历来是进入高校的敲门砖，但刘道玉却下决心给社会青年多一条道路。原来，他收到不少来信，很多都是因为高考失利而失去上大学或上重点高校机会的青年，他们在信中诉说了心中的苦闷，表达了强烈的求知欲望。刘道玉认为，高考虽然给青年人提供了走进大学、改变命运的机会，但因为高考只有一次，难免会有发挥失常的情况，同时以分数高低取人也未免有失公允。于是，他提出了实行插班制，就是由武大

自行组织考试，社会上的青年只要经过考试，就能进入武大进行3年学习，毕业后取得武大本科文凭。因为这项制度涉及多个部门，他先后多次进京专题汇报，用了近一年时间才成功。

从1985年至1987年，武大先后招收了三届插班生和两届作家班，招收的人数不算多，但在社会上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这给社会青年开启了一条走进知名高校的路径。山西省作协副主席哲夫，电视剧《乔家大院》编剧朱秀海等，都是插班生中的杰出代表。可以说，插班生培养出人才的比率，远高于普通班次。

刘道玉从来不摆校长的架子，喜欢倾听学生的意见，应邀参加学生的活动。他对校长办公室有三条要求：凡是学生写给他的信不能扣押；凡有学生要见他不得挡驾，但可以约时间；凡学生举行的活动应当通知他。从寓所到办公室，走路也就10分钟时间，但他常常一走就是半小时甚至一小时，因为经常有学生拉着他交流、提意见。每条意见他都认真倾听，一时解答不了的还要责成相关部门予以回应。他还多次参加学生代表与校方管理人员围绕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会，每次他都先让双方充分发表意见，几个回合下来，轮到校长发言，他总是十分平和地把双方的意见做一个归纳，最后总是站在学生这边。

武大创办新闻系后，首批毕业学员要去新闻媒体实习，因为新闻系知名度不高，很多中央新闻媒体都不接收。刘道玉听说后，带着新闻系主任前往北京，亲自到一家家媒体跑，请他们接纳学生实习。打通了中央新闻媒体实习通道后，学生再去省级媒体，就容易得多。类似这样的事情，刘道玉都是亲力亲为。师生们一边钦佩他的付出，一边又发自内心心疼校长，认为校长实在太忙了、太可怜了，都没有自己一丁点时间，甚至累垮了身体，看起来总是那么瘦弱。

在治理学校时，刘道玉还做出了很多具体的规定，背后都贯穿着他自由、平等的教学理念。比如，他规定学生宿舍到晚上不熄灯。在此之前，学校一到晚上10点，就统一拉闸关灯，要求学生上床睡觉，辅导员还要逐个宿舍进行检查。他认为，需要把选择的权力还给学生，由他们自己决定什么时间复习功课，什么时间上床睡觉。那时供电还不稳定，每当学校大停电时，学生们都能看到带着相关人员前来察看，要求尽快解决供电问题，一般用不了多久就能恢复供电。易中天说，那个时候的武大，领导生活简朴，作风民主；师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研究生论文答辩，可以当面顶撞评审委员；本科生学术演讲，校领导坐在下面洗耳恭听。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教员上课，学生开会，讲什么，怎么讲，没有人横加干涉，自由、民主、开放。很多学生都认为，这样的武大，值得一辈子回味。

留下太多的遗憾

正当刘道玉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时，1988年初，他却突然被免去武大校长职务，相关的改革也戛然而止。刘道玉曾在几本书里，分析了自己被免职的原因。一个是没有处理好与教育部的关系。他在推行诸多改革措施时，态度太强硬，缺乏灵活性，缺乏策略和变通方法，得罪了主管部门。刘道玉说：“我曾经跟教育部领导进行了三次辩论，当面拍桌子，指责对方无知、浅薄、偏见。”另一个就是没有处理好与湖北省委的关系，特别是武大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为争夺杨家湾80亩水田来建房，双方农民工打起了群架。湖北省委召集两校进行沟通，结果他和省委书记起了争执。第三个就是在武大内部，也存在一些反对的声音，有些人会向上级写告状信，罗列他的“问题”，希望能够整倒他。

对于刘道玉来说，最为愧疚的还是自己的妻子。当校长时，妻子非但没有享受过校长夫人的特权，反而失去了很多。她原本有出国的机会，却让给了别人。评教授时，她为了避嫌主动放弃，直到退休也不过是副教授。有一次在饭堂买饭，结果饭做糊了，有人很是不满，骂道“他妈的让刘道玉来吃一吃”。刘高伟就在后面排队，她听了后很难过。刘道玉被免职后，妻子很是为他感觉到委屈，抱着他痛哭了一场。看着妻子如此伤心，刘道玉也不由叹息。

被免职之后，当时还有好几条路可以选择，仕途一样可以维持下去。但刘道玉决心不再担任任何公职，执意留在武大当普通老师，想方设法把“教育改革事业”维持下去。他想着创办一所民办大学，为此跑了好几个城市，但20世纪90年代，国家对创办大学管控很严格，最后都没有搞成。

刘道玉又想办法搞中小学教育，1994年与人合伙创办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想从基础教育抓起，把创造教育的理念运用于实践。这个学校办了6年时间，确实获得了丰收、积累了经验。刘道玉为此呕心沥血，每天早晨从武大坐公交车去学校上班，还给学生上一门叫“创造思维方法”的课程，从教学大纲到授课内容，都是他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成了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

然而，投资人却欺骗了他，说是创办教育回馈社会，实际却是利用教育空手套白狼赚钱。2000年底，投资人携款潜逃，学校入不敷出，最后被迫关门。刘道玉的改革梦想又一次破碎，讨要学费的家长常常堵到他家门口。有人评论说，刘道玉一世的英名毁于一旦。

2001年的夏天，在好心学生的暗中帮助下，夫妻俩从武大悄然搬到了华中科技大学一套没有装修的毛坯房中。他们不敢与外人联系，终日只能相对而坐。想到晚景如此凄凉，刘道玉不由心



刘道玉与易中天讨论新书

生悲哀，是妻子的陪伴让他再次走出人生的至暗时刻。后来，刘道玉靠著书写作，慢慢还清了欠款。60岁后，他出了23本著作，写了500多篇文章，直击中国教育弊端，大声疾呼对教育进行改革。但这些观点只能作为学者的一家之言，并未能付诸实践。

2020年初，妻子重病住院，刘道玉在陪护期间突发高烧，万幸的是在武汉封城前一周，二老痊愈出院，没有被封在医院里。刘高伟患有多种慢性病，卧病在床好几年，刘道玉一直用心地照顾着她。刘道玉说：“她是我的精神支柱，而我是她的拐棍，我们风雨同舟，相濡以沫。”

刘道玉丝毫不回避死亡，反而早就留下了遗嘱，对身后事做了安排。他要把遗体捐献给学校，却要求留下自己的头发，以及已经掉落的牙齿，这样到了刘高伟去世时，就把头发、牙齿与刘高伟一同火化、埋葬，寓意“结发夫妻、没齿难忘”。他交代，他和妻子的骨灰分为两半，一半撒入长江，一半撒在珞珈山顶的松柏之间，实现他们的“山盟海誓”。

目前，刘道玉还担任着一个职务，就是刘道玉教育基金会的会长。2016年起，基金会在湖北省各地乡村学校建立“刘道玉教育理念实践项目学校”30所，建设“路石书屋”，推进“乡村教师培训”“网络安全教室”及“学校文化建设”等项目，为乡村教育发展、教育资源均衡做出了积极贡献。

刘道玉创造思维的火种，依然在顽强地闪烁着。（本文选自各界杂志2023年第2期）

特立独行的教育家 ——刘道玉漫谈教育

整稿 / 吴 爽

编者按：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教育家、有机化学家，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11月7日15时33分在武汉逝世，享年92岁。20世纪80年代，刘道玉在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推行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等系列改革，开创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珞珈山时代”。即便在卸任后，他仍以巨大热情投身教育研究与写作，笔耕不辍。今日，我们重载这篇来自《教育家》杂志2021年12月第5期对刘道玉的专访，以重温这位老教育家对教育的思考。



教育改革的道路艰难曲折，刘道玉坚定执着地走了几十年。

退休后，他依然呼吁和研究教育改革，直面教育问题，抨击教育弊病，笔耕不辍，出版了25本教育论著，发表了500多篇文章。

在他将届鲐背之年，仍践履笃行在教育改革的道路上，义无反顾。

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大潮中，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他引领学校独辟蹊径，倡导自由民主校风，率先创造性地实行了一系列新教育教学制度，从而拉开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

立足当下，关于如何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讨论热烈；回顾过去，高等教育在发展中积累了精神力量和经验智慧。刘道玉接受《教育家》专访，回顾了他的教育改革之路，分享了对当前教育发展的思考。

埋下种子：大学发展要有 先进教育理论引领

《教育家》：从化学领域转向教育学领域，您是怎样变成教育专家，完成角色转变的？

刘道玉：这个转变是源于早年埋藏在我心中的一颗“雪耻”的种子。耻从何来？早在1966年3月，国家高教部（当时分设高教部和教育部）在北京农学院举办了一场23所直属大学科研成果展览会，借以向中央汇报高等学校是科学研究的一支重要方面军，希望国家给直属大学增加科研经费。大约3月底，武汉大学领导组织全校科研骨干前往北京参观，我当时是一个科研组的组长，被选派首批前往。我们一行十多人，在参观过程中，自然十分关心本校展出的科研成果。

当我们置身于展览会上，看到了

北京大学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及其结构测定、清华大学的核反应堆、南开大学的高分子离子交换树脂、复旦大学的光光源、南京大学的内蒙古大草原的改造等，都是一个展室或展台，真是琳琅满目、五光十色，令人羡慕不已。我们到处寻找武汉大学展出的成果，但始终没有找到，最后在一个展台的一角，找到了一个像香烟盒大小的空气电池的展品。就在那一瞬间，我们感到无地自容，大家不约而同地摘下了佩戴的武汉大学红色校徽，生怕人家认出我们是武汉大学的教师，甚至觉得有人在背后指着我们的脊梁骨骂道：“你们还有脸来参观！”这次科研成果的排名，武汉大学排在23所直属大学的倒数第二名。

我们回到位于北京东新隆街的教育部招待所，当晚谁都无心去吃饭。自尊心人皆有之，这次参观最大的收获，

是看到了武汉大学的差距。往事过去15年，当自己成为武汉大学校长，自觉肩负起振兴武汉大学的重任。因此，在我履任之始，召开了首届科学研究大会，在会上我发出了“卧薪尝胆，十年雪耻”的誓言。振兴武汉大学强烈的使命感、热爱母校的赤诚之心、广大教师们的期盼、精心育人的责任心，不允许我有半点的犹豫，不允许我一心挂两头，必须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进入校长的角色，尽快完成从化学领域到教育学领域的转变。

我履新校长时，仅仅是一个化学讲师，行政级别是20级，连科级干部都不够格。于是，我想自己将如何领导好武汉大学呢？我清楚地认识到，领导好一所大学，不是靠职称、专业知识，也不是靠行政级别，而是要依靠先进的教育理论，按照教育规律领导和管理好学校。于是，我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充实和提高自己的教育素养——

第一，如饥似渴地学习世界教育家的名著，如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17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教育家让-雅克·卢梭的《爱弥儿》，捷克教育家扬·阿姆斯·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德国启蒙教育家奥古斯特·福禄贝尔的《人的教育》；英国教育家赫伯特·斯宾塞的《教育论》，约翰·洛克的《教育漫话》，约翰·亨利·纽曼的《大学理念》；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的《民主与教育》《明日之学校》和《自由与文化》，等等。在中国教育家中，我不止一次地阅读过蔡元培和陶行知的教育全集，逐步掌握了中外教育名著的精髓。

第二，走进教学第一线，亲自抓教育改革实验，通过实验方知什么样的制度才是适合自己大学的教育。80年代初中期，我校先后试行学分制、插班生



1992年,艾路明留美前与刘道玉话别

制、转学制、导师制等，都是先实验后推广的，这是积极稳妥的办法。

三大理念：把感性认识

逐步上升到理性认识

《教育家》：您提出创造教育、爱的教育、自由教育三大教育理念，可否阐释下这些教育理念的要义？对当下教育发展有怎样的观照？

刘道玉：我先后担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书记和常务副校长、常务副书记和校长，以及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司长，前后总共15年。其间，是我进一步学习教育理论的过程，既有武汉大学点上的试验，又有在全国许多大学调查的观感。我是一个事事留心的人，注意把感性认识逐步上升到理性认识，这就促使我开始形成自己的教育理念。

创造教育是我形成的第一个教育理念。大约1980年，我看到报刊上介绍创造学是一门新的学科，早在1938年在美国就诞生了，1953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创办了世界第一个创造学系，亚历克斯·奥斯本被称为创造学之父。这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并决心开始研究创造

教育，致力于培育创造性的人才，这与我幼年时期梦想成为一个诺贝尔式的发明家是不谋而合的。

“创造”与“创新”极易混淆，甚至有的教育家说，创新包括了创造，这是极大的误解。创造（creation）是从无到有，是做出首次、第一、率先和旷世绝伦的成果。而创新（innovation）是从旧到新，是改良、革新、刷新等之意。在英文中，还有两个词汇，一个是manufacture，另一个是mentifacure，前者是制造，后者是创造。虽然两个词的后缀facture是相同的，但前缀是不同的，manu是手工生产的就是制造，而menti是大脑，用头脑生产的就是创造。分清了创造与创新以及制造与创造的区别，方能够激励我们的创造精神，点拨创造的灵感，以填补我国在原创科学理论上空白的尴尬局面。

我的第二个教育理念是爱的教育，它形成于我在武汉大学和武汉市外国语学校改革的实践中。我切身体会到现在教育中爱的缺失，在大学中把学生分为进步与落后，对有缺点或有错误的学生另眼看待。在中小学中体罚屡禁不绝，普遍存在偏爱的倾向，即爱学习好的学



刘道玉与一线教育工作者合影

生，不爱学习差的学生，爱循规蹈矩的乖孩子，不爱调皮的学生……偏爱是不公平的教育，不相信爱具有转变或调动学生积极性的巨大力量。所以，我以身作则，把爱倾注给学习成绩不好、失恋的、偷书的和服刑的学生。作为教师和校长，要爱一切学生，接受有错误的学生；作为父母，爱孩子就接受不完美的孩子，这就是博爱，凡是有爱的阳光的地方，生命就会欣欣向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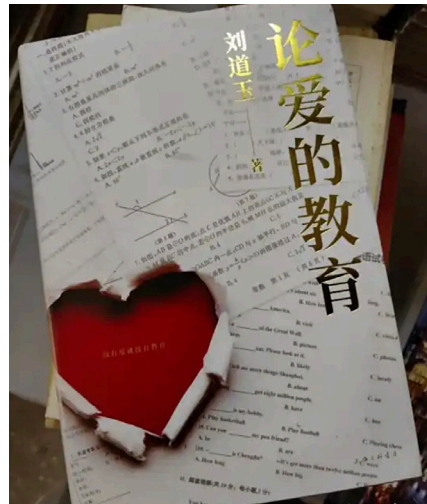
我的第三个教育理念是自由教育，集中地反映在我的《自由是教育核心理念》一文中。形成这个理念，是我从最朴素的观察开始的，我出生在农村，知道在板结的土地上生长不出粗壮的果木，而硕果只能生长在自由的园地里。鸟儿之所以栖息在大森林里，就是因为那里空气新鲜和自由。我从大学发展史知道，最早的大学都是教会创办的，为什么后来教育与教会分而治之？就是因为教义是不允许怀疑、质疑和批判的，但教育则必须提倡这三大精神。因此，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应当自由地探索真理，以培养追求真理的人才为己任。

总之，我的三大教育理念是互相联

系的，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没有创造就没有未来。改革是连接三大教育理念的链条，不彻底改革传统的僵化教育，是不可能建立起三大教育理念的。

大学展望：应充分调动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教育家》：您认为当代的大学应当怎样改革与发展？



《论爱的教育》是中国教育家刘道玉(1933-2025)创作的教育理论著作，2020年11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全书基于抗疫时代的社会教育需求，收录作者在武汉大学、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任职期间及退休后的教育思考，主张以“教育即解放”为核心构建良性教育生态，全书分教育即解放、呼唤爱的教育等五章探讨爱的本质及其育人功能

刘道玉：我认为改革与发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改革是质的改变，是走全新的办学路子，发展是数量的变化，如校园面积的扩大、学生数量的增加、校舍的扩展、图书与设备的增加、教师住房的改善等，不能以发展代替改革。



2012年,在北京举行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合影留念

大学究竟应当怎么办，我认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打破学年制的限制，实行弹性学制。人的天资和学习能力是有差别的，传统学制专科三年、本科四年，学生按照学年制同时入校，经过三年或四年学习又同时毕业，这是浪费学习资源。弹性学制与文凭制相结合，大学设置专科（2年）、大专（3年）、本科（4年）、硕士科（6年）和博士科（10年）五级文凭。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可以自由选择注册任何一级的文凭，通过考核或答辩合格，随时可以毕业，并获得相应的文凭和学位。

第二，尊重学生的志趣，实行滚动专业。专业的划分，既要符合学科划分的原则，又要适应产业发展的需要。专业设置要体现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防止专业狭窄，以便使学生适应日新月异变化的市场需要。学校要保证学生选其所爱、学其所爱，他们可以一次、两次转专业，一直滚动到他们满意为止。一个学生只有当他们选择到称心如意的专业，才会调动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也才可能成为杰出的人才。

第三，颠覆传统的课堂，提倡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学习是一种古老的学习方式，也是最有效的学习方式。古今一切大学问家，他们的学问都是自主学习而获得的，绝非课堂灌出来的。人类学习的历史，是从自主学习到讲授再到自主学习的过程，我们必须解放思想，提前适应以网络为平台的自主学习潮流。

第四，打破教学与科研之间人为分割的界限，科研要走在教学的前面，以科研带动学习。从本质上，教学是走前人走过的路，而科研是走没有路牌的路，前者获得的是间接知识，而后者是获得直接知识，也即通过科研而发现的真理。一个不会做研究工作的人，是很难适应以创造为



武汉大学的老中青校友看望刘道玉老校长，带来一份特别的礼物——易中天教授的题词：曾经华夏千雏凤，永是珞珈一少年

特征的信息时代需要的。

第五，开放校园，资源共享。鉴于我国大学数量多、水平相差悬殊，实行同类和水平大致相同大学之间互相开放。打破大学部门所有制，资源共享，互相承认学分和学历。提倡游学访贤制度，师生互相选择，最大限度地发挥名师的作用。游学是一种我国古代独创的学习制度，它孕育出了许多大师级别的人才，他们也都是著名的游士，其中诗仙李白的一生都在游历的路上，所以他才创作出万首不朽的诗篇。诗圣杜甫评论说，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第六，网上网下结合，扬长避短。自2012年开始，美国率先掀起了网络教学的风暴。他们先后创建了Udacity、Coursera、Adx三大网络平台，对开展网络教学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在热了一阵子之后，又冷了下来，说明传统的教育观念比较顽固。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人类诸多的发明成果中，从来没有哪一项发明像网络技术发展如此迅速，对生产、商业、生活甚至思维方式的影响如此之大。因此，网络教学不可替代，我们必须提前应对，设计网络课

堂、实行网络阅览、编写网络教学指导书，以适应全新教育时代的到来。

读懂学生：培养杰出人才的关键在“不拘一格”

《教育家》：很多武大校友说您读懂了学生，称您为“永远的校长”。您担任武大校长时推行“博爱教育”，坚持接近学生、走近学生，您认为，大学教育中教育者应该如何面对学生，与学生保持怎样的关系？

刘道玉：学生是学校的主体，包括校长在内的所有人员和全部工作，都是为学生成才服务的。因此，校长应当接近学生，走近学生，不管工作如何繁忙，接待学生的来访，倾听他们的意见，是校长不可推卸的一项重要任务。怎样才算是读懂了学生呢？我以为有三条标准。第一，如果说顾客是上帝，那么学生是大学中的顾客，他们也是上帝，对顾客的要求必须按照优先的原则予以满足。第二，学生既是受教育的对象，又是教育改革的依靠力量，而且是改革成效的直接检验者。第三，学生处于长身体和长知识的时期，他们也有缺点，也会犯错误。我们应当允许



1980年代他担任武大校长期间，披荆斩棘、兼容并包、爱才如命、敢作敢为，成为教育改革的先行者。武大因此成为世界名校，培养出杨小凯、易中天、邓晓芒、陈浩武、赵林、雷军等一大批青年才俊

犯错误和改正错误，正确的教育方法是正面引导，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要抓住小辫子不放，动辄进行惩处。同时，应当提倡他们自己教育自己，相信他们能够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路也一定会走得更好。

那么，校长与学生应当是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应当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作为教师要肩负起传道、授业、解惑之责；作为友，要做到互相关心、互相激励、互相帮助。校长要做到先当学生后当先生，教学相长、能者为师，要力求做到：作为受教育者的教育者应当死去，以便作为受教育者的受教育者而新生。

我给学生写的赠言是：“路石（我的笔名）无语任践行，人梯无怨拱攀登。”学生写给我的赠言是：“天下良师皆父母，满园桃李亦儿女。”这就是理想大学中新型的师（包括校长）生关系。

《教育家》：在发现和培育有天赋的学生方面，您近年有哪些新的思考与认识？

刘道玉：实际上，我的新书《生命维新》是一部以才兴校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发现、培养和保护人才的历史。人始终是教育的中心，人才则是教育的终极目标。爱才不能仅仅是一句口头禅，杰出人才能否冒出来，最关键的是“不拘一格”，在现实生活中束缚人才的“格”太多了，如学历、学位、性别、年龄等。真正爱才者，要敢于打破“格”的束缚，敢于保护和使用有争议的人才。在书中，我总结出了识才看“三性”（个性、悟性、灵性）；用才看“三力”（自学能力、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管理特殊人才“三不问”（不问做什么、不问进度、不问结果）。也许，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我认为这些是开明之举，一个大学校长不应当是“生产队长”，要学会当一名“啦啦队长”。

我最近刚刚写了一篇“呼唤全才”的文章，这是我的新认识，也是被人们

所忽略的一个问题。回望世界人才的历史，无论是古希腊或文艺复兴后的欧洲，绝大多数都是全才，如牛顿、培根、莎士比亚、笛卡儿、帕斯卡尔、费马、哈维、伽利略、开普勒、达·芬奇……经过研究，我给全才下了一个定义：凡精通三门一级学科或以上且在每个领域做出重大建树者。全才最重要的作用是，他们往往在科学交叉的领域做出重大的发现与创造。全才是科学的象征，是一个国家屹立于世界科学先进之林的需要。

《教育家》：您经历了高光时刻，又在高峰中“跌宕”，您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沉迷于往日的荣光，选择回到高校当“学术官”——校长，您是否有遗憾？

刘道玉：我国明朝文学家、思想家洪应明在《菜根谭》中有一副对联：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任天上云卷云舒”。这是一种境界，它超越了功名利禄，舍去了个人的恩怨和得失。有了这样的境界，什么“高光”和“跌宕”都是不足挂怀的，能够做到淡然对待。孔子在《论语·述而》中也有一句名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他的意思是说：用你，就干一番事业；舍你（就是不用你）就藏起来。前面一句我做到了，但后面一句我却不想躲藏起来，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事。在任期的岗位上，我自喻是一头“躬耕牛”，埋头拓荒。离任校长后，我转身为一只“杜鹃鸟”，以呐喊的方式呼吁教育改革。我非常喜欢宋朝王令的诗句：“子规夜半欲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我希望以自己微薄的力量，助力教育发展。（本文选自《教育家》2021年12月第5期，有改动）

一生长立月明中^①

——徐渭及其书画赏评

文 / 洪忠良

嘉靖、隆庆和万历年间，是明代中期向后期过渡，手工业、商业空前活跃的时期。宦官、文官“威柄之操，几于震主”^②，“南倭北虏”两大边患始终困扰着政局。文坛以复古派称盛，而理学则有王阳明师心直觉，“二者根本抵牾而竟齐驱不倍”^③。文坛怪杰徐渭就生活在这个热闹的时空。万历二十五年（1597），徐渭亡后4年，袁宏道来会稽，偶见其生前潦草刊印的诗集《阙编》一帙，“称为奇绝，谓有明一人，闻者骇之。”^④山阴张岱云：“今见青藤诸画，离奇超脱，苍劲中姿媚跃出，与其书法奇崛略同。”^⑤袁枚《随园诗话》卷六上三十记山阴童二树《题青藤小像》云：“抵死目中无七子，岂知身后得中郎。”又曰：“尚有一灯传郑燮，甘心走狗列门墙。”郑燮、石涛、吴昌硕、齐白石对徐渭的书画艺术均顶礼膜拜。

徐渭生平简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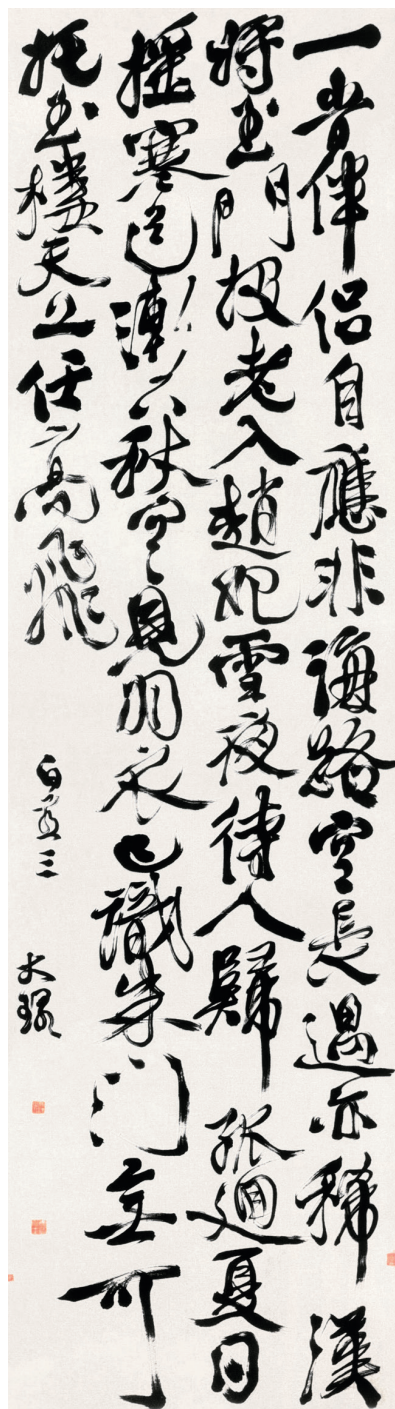
徐渭(1521—1593)，初字文清，后改文长，号天池、天池山人，或款署大环、田水月、青藤老人、青藤道人、金垒、金回山人、山阴布衣、白鹇山人、鹅鼻山依等。

他的父亲徐鏊，官夔州府同知，以五品致仕返乡。原配童宜人生二子，长子徐淮（1492—1545），次子徐潞（1501—1540）。童宜人去世，续娶苗宜人，未育。晚年纳苗宜人侍女苗氏为妾，生徐渭。正德十六年（1521）辛巳二月四日，徐渭生于绍兴府山阴县大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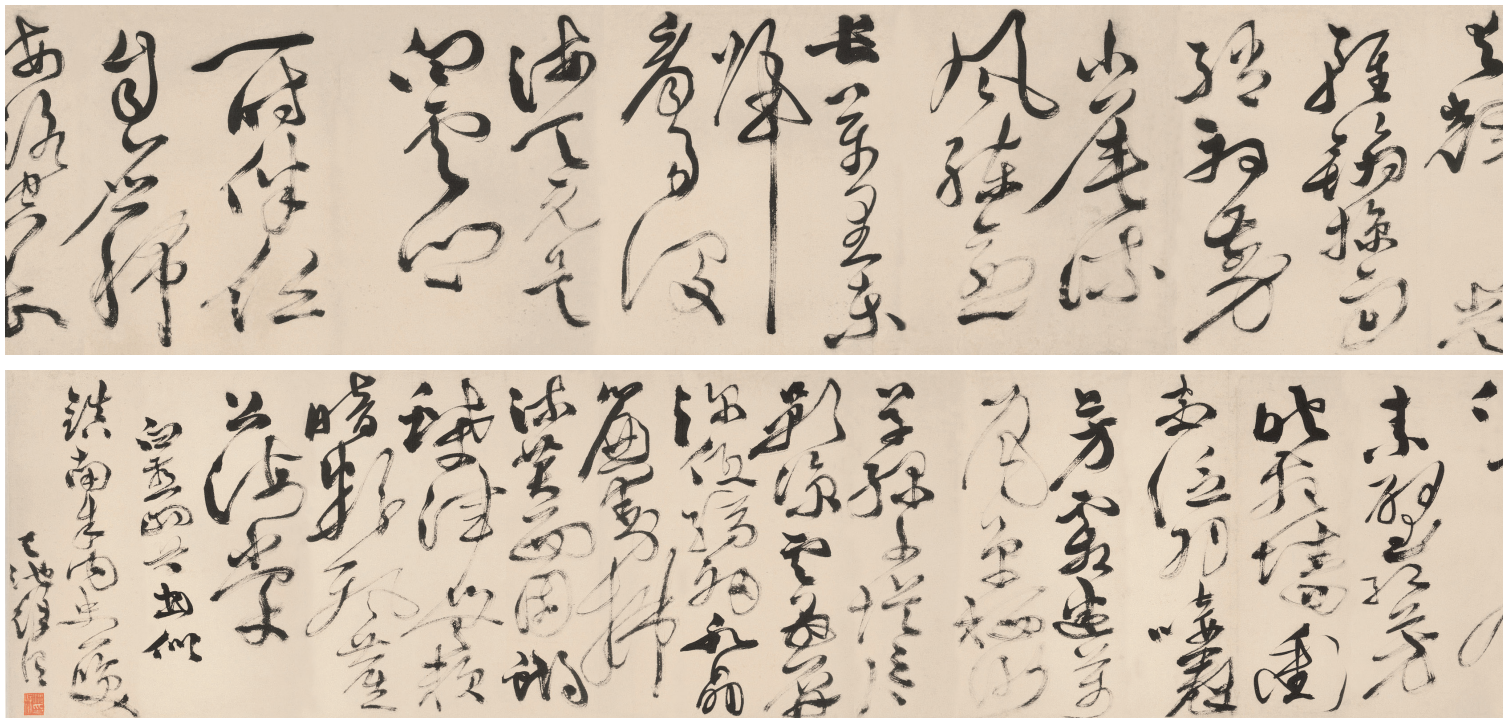
坊（今绍兴市区）“观桥大乘庵东”榴花书屋。^⑥徐渭初生之日，父亲给他取名为渭。徐渭出生一个月时，明朝正德帝“崩于豹房，年三十有一。”^⑦徐渭出生100天时，徐鏊去世。10岁时，家道中落，生母苗氏被嫡母苗宜人遣散。苗宜人性绝敏，略知诗书，钟爱并教育徐渭，对其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徐渭14岁，苗宜人卒，徐渭依长兄徐淮生活和读书。

徐渭早慧，六岁上小学，“受《大学》，日诵千余言。”“生九岁，已能习为干禄文字。”^⑧“十五六时，学剑于彭如醉名应时者，俱不成。”^⑨17岁时初次童试考秀才，未取，20岁再试，又未取，被允复试，遇山阴县令方廷玺提调，取为生员。嘉靖二十年（1541）娶同县潘克敬女为妻，入赘。嘉靖二十三年（1544）沈炼丁父忧归故里，徐渭与陈鹤、朱公节、沈炼、钱鞭、姚林、诸大绶、吕光升、萧勉、杨珂结“越中十子”社。嘉靖二十五年（1546）十月，妻子潘氏病死。他孤身“赴太仓州，失遇而返”^⑩，谋事无成。而他兄长二人也遭病故，徐家房产、田园已荡然无存。考场失意，接连的不幸，使徐渭身心俱累。嘉靖二十七年（1548），徐渭“背负一蒯剑，挟数败囊书，来侬屋东城里中”^⑪，离开岳父独自开学馆授徒，卖文谋生。他以自撰对联中有“官墙在望居三卜，天地为林鸟一枝”将学馆命名为“一枝堂”。并追随长沙公季本研习王阳明的学说。^⑫

嘉靖三十一年（1552），32岁的徐渭



明 徐渭《白燕诗轴》
264.1cm×73.5cm 纸本 行书
浙江天一阁博物馆藏



明 徐渭《白燕诗卷》 30cm×420.5cm 纸本 草书
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第五次应试。应试前参加岁考，他的卷子得到主考的欣赏，获得廪生资格。但在省城的考试依然未中。此后，徐渭在35岁、38岁、41岁又三次参加了在杭州的乡试，均落榜。徐渭心中极度失望，忧伤，精神上受到了很大刺激。他在《畸谱》中云：“余奔应不暇，与科长别矣！”^⑧至此，应试求官之心遂冷。

嘉靖三十三年（1554），倭寇进犯浙闽沿海，徐渭先后参加了柯亭之役、皋埠之役、龛山之役，其军事才能引起了浙江巡抚胡宗宪的注意，邀徐渭入总督府任记室，又出奇计大破徐海等倭寇。

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一月，胡宗宪被劾为“党严嵩”，后“瘐死狱中”^⑨。徐渭为受牵连恐慌而因此发狂，作《自为墓志铭》，三次自杀。同里人陶望龄在《徐文长传》中叙述说：“渭虑祸及，随发狂，引巨锥刺耳，深数寸，流血几殆；又以椎碎肾

囊，皆不死”，精神失常，几近癫狂。嘉靖四十五年（1566）在发病时杀死继妻张氏，下狱七年。以注释《周易参同契》，研习书画消日。万历元年（1573年）大赦天下，53岁的徐渭为状元张元忬所救出狱。徐渭出狱后，自营的酬字堂因入狱后为打点官府费用被变卖，就租梅花馆居住。“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是徐渭当时写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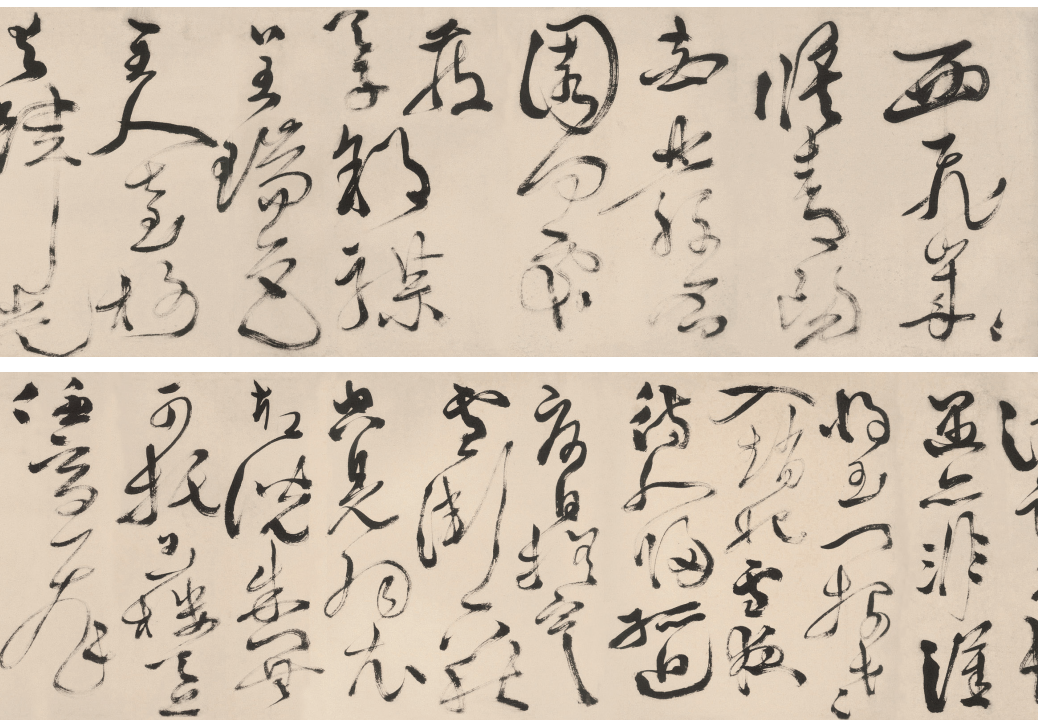
万历三年（1575），徐渭应翰林院编撰张元忬之请，参与纂修《会稽县志》。万历五年（1577），他又应巡抚吴兑之聘，赴宣化府充任文书，以为稻粱谋，并因此游历北疆。五年后（1582），徐渭因旧病复发，返回山阴定居。晚年他贫病交加，常至断炊，“有书数千卷，后斥卖殆尽。畴荒破弊，不能再易，至借稿寝”，常“忍饥月下独徘徊”，杜门谢客，“显者至门，皆拒不纳；当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⑩万

历二十一年（1593），徐渭73岁，作自传《畸谱》，他作诗自许“桃花大水滨，茅屋老畸人”。^⑪临终之时，以破絮盖身，草葬于绍兴城西南十五里木栅山。《刻徐文长佚书序》时记：“闻死之日，四大作金黄色，故足怪也！”^⑫

徐渭的书法艺术

徐渭“尝言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袁宏道则说：“予不能书，而谬谓文长书决当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矣！”当此之时，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评价道：“天下法书归吾吴，祝京兆允明为最，文待诏征明、王贡士宠次之。”而袁宏道竟称徐渭书法在吴门领袖之上，可谓见识超前。

在徐渭的传世作品中，行书面目居多，作品亦多，但传世的徐渭早年书迹较少。徐渭后来抄写《初进白鹿



表》^⑧大概是较早的行楷风格吧。这件小行楷，俊秀道媚，有二王、苏东坡、米芾诸贤之秀逸。《绍兴府志》载徐渭隆庆入狱期间（1566—1572），“素工书，既在縲继，益以此遣日”。彰显徐渭个性印记的楷书、小草书、大草《千字文卷》三种当是此期间作品。从徐渭题款隆庆改元的《李白蜀道难草书卷》的小草书及隆庆春之望后（1567）所书《春雨（风）剪雨宵成雪卷》大草书卷来看，前者秀丽，徐渭自云：“《蜀道难》可得南宫之五、六，至其它，仅大令之二、三耳！”；后者为狂草，多用怀素圆转笔法，极富视觉冲击力，是徐渭离开“诸体杂糅”，是徐渭草书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作品。大约在隆庆三年（1569），徐渭减刑，摘除脚镣、手铐和枷，当为方便大量研习书画之始，^⑨有《前破械赋》《后破械赋》^⑩以记其事。其时题《墨牡丹》册页云：“四十九年贫贱身，何尝妄忆洛

阳春。不然岂少胭脂在，富贵花写墨写神。”万历五年（1577），徐渭57岁时作《跋画十六种花诗卷》《女芙馆十咏卷》，到稍后所作的手卷《淮阴侯祠诗翰卷》，集中了徐渭的书法的多种面目，行草书或行楷书、章草相杂，精彩绝伦，当为徐渭手卷杰作。

万历九年（1581）年前后，徐渭应张元忭邀在京，有作巨制的需要与条件，现藏苏州市博物馆的两件丈二大轴《应制咏墨词轴》《应制咏剑词轴》为此期所作。结字大多宽绰，几乎将行距压迫殆尽，作品布局浑然一气，茂密如急风暴雨，从而造成茂密冲突的强烈气势。整幅作品看似点画狼藉，疾风迅雨，然笔画出锋、枯笔或涩笔处不失细微处之交代，作品整体撼人之心魄。如此巨制，徐渭能于迅疾用笔之中，谋篇成章，散而不乱，反映了其驾驭笔墨的超高才能，实非常人所能及。推想徐渭作此大轴时，体魄与精神应该较为健

旺，当有牵纸与喝彩之人在旁。徐渭评李北海（邕）的字“遇难布处，字字侵让，互用位置之法，独高于人。”^⑪在徐渭此类超大立轴中，是字字行行相侵了，李北海影响于徐渭可谓大也！徐渭于李北海书真可谓解人。

万历十年（1582）二月，徐渭病，随长子徐枚由京返绍兴，书风总体稳定而渐趋平淡。万历十七年（1589）二月，徐渭羸眩而跌，臂骨脱臼。后写于寓所“樱花馆”的《闻有赋坏翅鹤等十五首四体卷》，大部分是行草书，后有小段章草，全卷清朗沉雄，当是小儿徐积入李如松军营做幕僚营生后，徐渭病臂愈后性情开朗之际所作。万历十九年（1591）写《杜甫秋兴八首诗册》用笔凝练简洁。书于万历二十年（1592）的《煎茶七类》卷、《梁武帝评书四体卷》卷、《陈家豆酒名天下》，用笔略显秀逸细腻，结体疏朗淡宕，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时徐渭离去世的万历二十一年（1593）不过一二年了。

徐渭的书法亦是其狂放恣肆的人格体现。他的作品笔意奔放，似胸中有一股“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⑫乾隆《绍兴府志》言，文长“于古书法多探绎其要领。主用笔，大率归米芾之说；工行草，真有快马斫阵之势”。用笔狂烈，笔力劲健，线条苍辣爽疾，豪迈不羁，苍劲姿媚，方圆兼济，轻重自如，是他书法的最大特色。

“凡临摹直寄兴耳，铄而较，寸而合，岂真我面目哉？”^⑬徐渭学书，无史料记载师承同时代何人。自谓颇学钟王，于苏、黄、米、张弼，以及张旭、怀素、李邕、倪瓚等都有会心，其笔法，多用米芾笔法，而结字趋扁，有东坡遗意。他评赞倪瓚书“古而媚”，“密而散”，这正是他自己追求书法的风格特征。徐渭少年时学画的老师陈鹤



明 徐渭《四季花卉图》
144.7cm×81cm 纸本 水墨

亦善书，嘉庆《山阴县志》载：“书效苏（轼）米（芾），间出己意”。徐渭与越中十子、书家杨珂（字汝鸣，号秘图，又号怡斋，余姚人）多过往唱和。

《余姚县志》谓杨珂“幼摹晋人帖逼真”，“多作狂书”。杨珂书法“大小不齐”，颇被项穆批评。^④徐渭在《跋赵文敏墨迹洛神赋》中说：“古人论

真、行与篆、隶，辨圆方者，微有不同。真行始于动，中以静，终以媚。媚者，盖锋稍溢出，其名曰‘姿态’，锋太藏则媚隐，太正则媚藏而不悦，故大苏（苏轼）宽之以侧笔取妍之说。”^⑤可见徐渭推重苏轼书法。而在作于隆庆元年（1567）的墨迹《寄云岳子等九首四体册》中，可看出沈周、祝枝山书法对徐渭早期书法的影响。徐渭的草书结字用笔大体来自二王和怀素，也曾经学习索靖章草，故在他用笔中还时见章草波挑笔意，用以增添古拙而出之姿媚。

“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必非高书。”在隆庆四年元旦，徐渭在狱中作《评字》，^⑥对宋代诸书家逐一品评，又有一篇《书评》，对历代书家的得失进行议评，都有他个人的独到见解。徐谓论书法尚有《笔玄要旨》一卷和《玄抄类摘》六卷，前者有明刻本，后者在日本有刻本。

徐渭的绘画

徐渭在他擅长的文学艺术中，绘画是开宗之派影响后世的。徐渭擅长花鸟，兼能山水人物，水墨写意，气势纵横奔逸，不拘绳墨，笔简意浓，形象生动。在作品中，多题诗句，抒写对世事的愤懑与自己对身世的慨叹，把诗、书、画三位一体的表现形式推至更完美的境界。徐渭自谓少年时曾向山阴画家陈鹤学画，“雅相抱笔伸纸以朝夕”，^⑦陈鹤善画，嘉庆《山阴县志》载：“尤以水墨花卉，名绝一时。”所画牡丹属水墨偏工一路，今上海博物馆藏陈鹤作品可窥其大概。今日所见之徐渭画风，恐怕是在牢狱之中开始的。

徐渭诗云：“世间无事无三昧，老来戏謔涂花卉。藤长刺阔臂几枯，三合茅柴不成醉。葫芦依样不胜揩，能如造化绝安排。不求形似求生韵，根拔皆

吾五指裁。胡为乎，区区修剪而叶裁。君莫猜，墨色淋漓两拨开。”^④徐渭的写意花鸟画，“不求形似求生韵”、“墨色淋漓”比陈淳（白阳）更为放纵。在陈淳的基础上，将小写意发展为笔墨恣肆的大写意。徐渭较多地在生纸上作画，得力于非同凡响的笔墨功夫。徐渭的写意花卉，“走笔如飞，泼墨淋漓”，强调用笔之气、用墨之韵。笔与笔之间有“笔断意不断”的气势贯通着；徐渭善用水墨，看似狂涂乱抹，满纸淋漓，实际上是墨团之中有墨韵，墨法之中显精神。笔墨在他那里已不是问题，物象只不过是载体，他将自己的人生升腾于笔墨、物象之上，笔简意浓，形象生动，在明代摹古之风盛行、辗转抄袭缺乏创造的画坛，徐渭开创的水墨大写意画，让人耳目一新，开启了明清以来水墨写意的新途径。清代朱耷、石涛、扬州八怪中的李颀、李方膺、当代齐白石均法乳青藤老人。

徐渭传世绘画作品中，以《葡萄图》轴为多且最有名，有三件藏于故宫。另有《山水人物花卉册》《牡丹蕉石图》轴和去世前一二年所作《花卉卷》《花卉图卷》《风鸾图卷》等藏于上海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等。

徐渭画墨葡萄及题诗“半生落魄已成翁”最早者，为万历七年（1579），是年59岁，当是在徐渭出狱后十年浪迹漂泊之际。《墨葡萄图》构图独特，自右上写葡萄一枝，画藤条纷披错落，向下低垂。纯以水墨写葡萄，随意涂抹点染，任乎性情。以饱含水分的泼墨写意法，点画葡萄枝叶，水墨酣畅。葡萄珠的晶莹剔透之感，显得淋漓酣畅。可看作是文人画中趋于放泼的一种典型。作画状物不拘形似，仅略得其意，重在寄兴遣怀。此图将水墨葡萄与徐渭“墨点多无泪点多”的落魄身世感慨结合为

一。一种饱经患、抱负难酬的无可奈何的愤恨与抗争，尽情宣泄于笔墨之中。

另有《山水人物花卉册》^⑤，水墨纸本16开，册尾徐渭题曰“万历戊子（1588）夏仲，偶闲寓宗侄子云斋中漫为执笔，真儿戏也，青藤渭”。册页中画有人物多幅，有登高一览山景的高士，或树荫下傍石而坐的弈棋者，或撑篙而行舟破芦荻的渔翁，或依岸下网的镜湖渔者，寥寥数笔挥洒自如地把人物描绘出来，颇具当时生活气息。徐渭偏爱《牡丹蕉石图》，图中怪石、芭蕉、牡丹纯以水墨纵横抹出，以点为主，略作勾笔，浑厚华滋，酣畅淋漓。明代如徐渭兼善绘事各科，以水墨写意，挥洒自如地描绘情景交融的现实生活的画家不多。

徐渭的诗文、书法和戏剧得到袁宏道的赞赏，“今海内无不知有徐文长矣。”^⑥袁宏道认为徐渭的绘画“间以余旁溢为花草竹石，皆超逸有致”^⑦，并不太在意。在当时以始于沈周的吴门画派与松江董其昌表现“古雅幽静”“萧散淡逸”“蕴藉含蓄”的审美情趣为标准的文人画观念影响下，用笔狂放，墨法变化多端，出神入化，徐渭开创的水墨大写意有“徐家野逸”之意^⑧，与后来擅长没骨写意花鸟画的陈淳（1483—1544，号白阳山人），并称“青藤白阳”。到了晚明，陈洪绶才开始对徐渭的画作有独到的见解。明董環《青藤书屋记》载：徐渭亡后40年，陈洪绶从诸暨迁居徐渭故宅，识其处曰“青藤书屋”^⑨。明张岱曾言徐渭：“今见青藤诸画……故昔人谓摩诘之诗，诗中有画；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余亦谓青藤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书。”^⑩

徐渭的画名声大噪是开始于清代。八大山人和石涛都十分推崇这位大写意



明 徐渭《墨葡萄》立轴
96cm×29.2cm 纸本 水墨

画的开山祖师，石涛自题《四时花果图》卷有句“青藤笔墨人间宝，数十年来无此道。”郑燮特刻一印章以述怀“青藤门下牛马走郑燮”。^⑪吴昌硕说“青藤画奇古放逸，不可一世似其为人。想下笔时，天地为之低昂，虬龙失其天矫。”^⑫当代花鸟画巨匠齐白石说



明 徐渭《榴实图》
91.4cm×26.5cm 纸本 水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得更为动情：“青藤、雪个八大山人、大涤子石涛之画能横涂纵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三百年前或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之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⑲

注释：

- ① 句出徐渭诗《望夫石》，《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下同)343页
-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〇《大礼议》
- ③ 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版303页
- ④ 陶望龄《徐文长传》，《徐渭集》1341页
- ⑤ 张岱《娜嬛文集》卷五《跋徐青藤小品画》，上海杂志公司1935年版147页
- ⑥ 徐渭《畸谱》《徐渭集》1325页；嘉庆重修《山阴县志》卷二十八载：榴花书屋，在大云坊大乘庵之东，徐渭降生处
- ⑦ 《明通鉴》中华书局1980版1315页
- ⑧ 徐渭《自为墓志铭》《徐渭集》638页
- ⑨ 徐渭《畸谱·纪知》《徐渭集》1335页
- ⑩ 徐渭《畸谱》，《徐渭集》1327页
- ⑪ 袁宏道《徐文长传》《徐渭集》第1343页
- ⑫ 徐渭《畸谱·师类》，《徐渭集》1332页
- ⑬ 徐渭《畸谱》，《徐渭集》1328页
- ⑭ 《明史》卷二百五《胡宗宪传》5414页
- ⑮ 袁宏道《徐文长传》《徐渭集》第1343页
- ⑯ 徐渭《答沈嘉则二首次韵》，《徐渭集》1192页
- ⑰ 张汝霖《刻徐文长佚书序》，《徐渭集》1348页
- ⑱ 徐渭《初进白鹿表》拓本，藏绍兴市文物局

- ⑲ 刘正成《徐渭书法评传》，《中国书法全集(第53卷·徐渭)》荣宝斋出版社2010版15页
- ⑳ 《徐渭集》44页
- ㉑ 徐渭《书李北海帖》，《徐渭集》573页
- ㉒ 袁宏道《徐文长传》，《徐渭集》1343页
- ㉓ 徐渭《书季子微所藏摹本兰亭帖》，《徐渭集》577页
- ㉔ 项穆《书法雅言规矩》，《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523页：“后世庸陋无稽之徒，妄作大小不齐之势，或以一字而包络数字，或以一傍而攒簇数形，强合钩连，相排相纽，点画混沌，突缩突伸，如杨秘图、张汝弼、马一龙之流，且自美其名曰梅花体。”
- ㉕ 徐渭《跋赵文敏墨迹洛神赋》，《徐渭集》579页
- ㉖ 徐渭《评字》，《徐渭集》1054页
- ㉗ 徐渭《陈山人墓表》，《徐渭集》640-642
- ㉘ 徐渭《画百花卷与史甥，题曰漱老谑墨》《徐渭集》154页
- ㉙ 《徐天池墨笔山水人物花卉册》，真迹藏故宫，珂罗版商务印书馆1934年初版，吴昌硕题签
- ㉚ 张汝霖《刻徐文长佚书序》，《徐渭集》1348页
- ㉛ 袁宏道《徐文长传》《徐渭集》第1343页
- ㉜ 沈括评南唐画家徐熙为“以墨笔为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气迥出，别有生动之意”，见百度百科《徐熙》
- ㉝ 嘉庆《山阴县志》卷二十八
- ㉞ 张岱《娜嬛文集》卷五《跋徐青藤小品画》上海杂志公司1935年版147页
- ㉟ 袁枚《随园诗话》卷六上三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版178页
- ㊱ 《缶庐诗别存》卷一《葡萄》，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刻本
- ㊲ 《齐白石画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版40页

笔底明珠掷藤中 ——谈谈徐渭笔下的墨葡萄

文 / 杨桂思



图二 明 徐渭 墨花十二段之葡萄
32.5cm×795.5cm 纸本 水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墨葡萄”已然成为徐渭的作品符号。原因之一是他的代表作《墨葡萄图》(尤其是图一)广为人知，二是他画的葡萄题材的确很多，三是他的号“青藤”，也容易让人联想到葡萄藤。

在狱中度过七年的岁月后，徐渭先是被保释，三年后正式被释放。他原先的住所——酬字堂，即著名的青藤书屋，在他入狱后不久，已经被典卖。所以他出狱后只得租赁人家的房子来住。租住的房子被他称为梅花馆。梅花馆中种有一架葡萄。徐渭有《理葡萄诗跋》：

予柿叶堂西，少嘉木。夏苦日炙。繚以修篁，而两岁笋孙不百个。或教予种葡萄，易蔓而多荫，再秋梗如蛇虺，叶大如掌，结实累累，不独可移绳床，

且消肺渴。^①

植葡萄、尝葡萄，在葡萄架下的绳床上享受阴凉——葡萄带给徐渭多少甜美、愉悦与深思！大概从这时起，徐渭就将葡萄入画了，并且成为他最拿手的题材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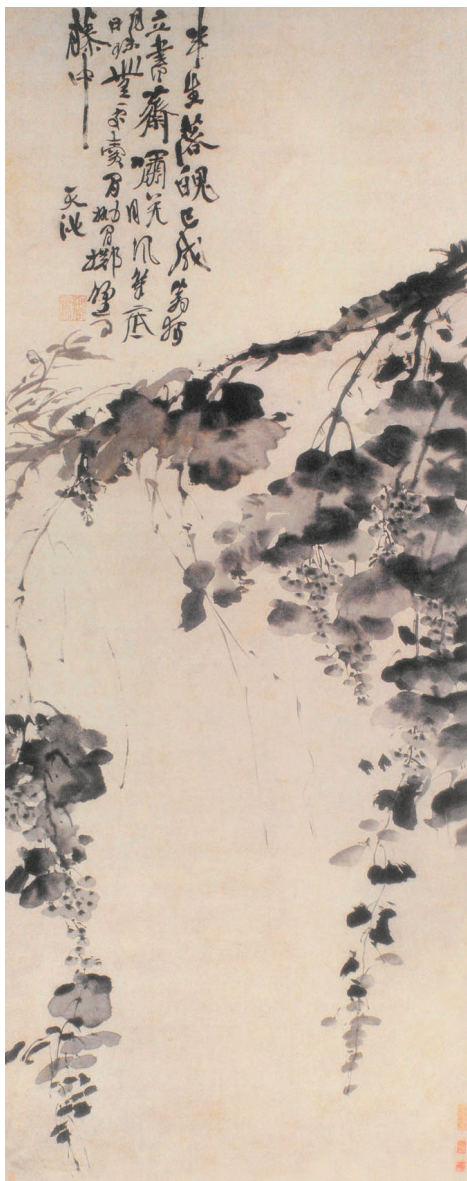
说起来，以葡萄纹样作为工艺装饰题材，在汉、唐已十分盛行，而转为绘画题材却较晚。现存最早的葡萄作品是南宋画院待诏林椿的《葡萄草虫图》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系工整精致的院体画风；痴迷于画葡萄，徐渭也并非第一人。宋末元初的画家温日观就善于画葡萄，自成一派。他以笔中带有深浅不同的墨色画叶，并以深墨点染仍带湿润的葡萄，来表现明暗和体积，颇显自然逼真，人称

“温葡萄”，水墨写意葡萄即始于温日观。然而历史上提起“墨葡萄”，人们最先想到的还是徐渭。只因为葡萄之于徐渭，好比钟子期之于俞伯牙，葡萄读懂了徐渭的心，徐渭明白葡萄的寂寞，两个孤寂的灵魂彼此有了慰藉。我们看到徐渭在墨葡萄中寄予的情感：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见图一、图三、图六的题画诗)

“璞中美玉石般看，画里明珠煞欲穿。世事模糊多少在，付之一笑向青天。”(见图十的题画诗)

“昨岁中秋月倍圆，海南母蚌太酣眠。明珠一夜无人管，迸向谁家壁上悬。”(见图七、图八的题画诗)



图一 明 徐渭 墨葡萄图
165.7cm×64.5cm 纸本 水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四 明 徐渭 墨葡萄图
118.3cm×38cm 纸本 水墨
上海市博物馆藏

“佛氏衣边说有珠，艰如铁网海南渔。余之腹内饶三斛，化作葡萄树一株。”（见图一的题画诗）“那堪明月三五夜，照见如丸一两横。”（见图四的题画诗）“几串明珠挂水清，醉来将墨写能成。当年何用相如璧，始换西秦十五城。”（见图五的题画诗）“自从初夏到今朝，百事无心总弃抛。尚有旧时书秃笔，偶将蘸墨点葡萄。”^②

“王生昔日好容颜，今日相逢范叔

寒。赠与明珠三百颗，谁知一颗不堪餐？”

徐渭在这些题画诗里，把葡萄比喻为“明珠”——乃价值连城、珍贵稀有之物。但是这些明珠的遭遇是“无处卖”“无人管”“一颗不堪餐”。“明珠”的遭遇堪叹、堪怜。而这其实不正是画家本人才华横溢而不为世重、落寞凄凉直至衰年的写照吗？

徐渭才华卓越而全面，他的同乡陶望龄将其和陆游相提并论；^③冯其庸先生

认为只有苏东坡能和他并驾齐驱。^④在诗、文、书、画中，徐渭自诩书法排在第一位，“公安三袁”之一的袁宏道也认为其书在王宠、文徵明之上；至于诗歌，袁宏道最为推崇，认为“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⑤黄宗羲也充分肯定了徐渭文章的成就；徐渭的绘画，先是朱彝尊最为推重，而后在清代被推崇至高的地位；戏曲方面，汤显祖曾感叹徐渭所作的戏曲《四声猿》“乃词场飞将，辄为之演唱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而周亮工则认为，徐渭的作品，包括戏曲在内，都是一流的，没有先后高下之分。可就是这样一位旷代奇才，却托足无门、多灾多难、不见用于时，最后在疾病和贫困中死去。正如黄宗羲所描述的“踽踽穷巷一老生，崛起不肯从人议。破帽青衫拜孝陵，科名艺苑皆失位。”^⑥其遭遇之悲惨，在历代文人中，都是极为少有的。

徐渭说，“墨把丹青等闲看，无声诗里颂千秋”。他将胸中的一腔不可磨灭之气，喜怒哀乐、怨恨思慕，凡有所动，一一放意于绘画中。所以徐渭的画作，是有其深刻的情意在其中的。不过这种情感，有时是轻松的，有时是沉重的；或如春花秋月下的低吟浅唱，或如疾风骤雨中的伤感悲号。而在墨葡萄中寄予的，无疑多是后者，是一种沦落悲愤之感。

常常是在畅饮之后，徐渭才放手作墨葡萄图。因为他在墨葡萄的题画诗里说“余之腹内饶三斛”“醉来将墨写能成”。一次，他为晚年时的好友史甥绘完一幅画卷后，题写道：“小白连浮三十杯，指尖浩气响春雷。惊花蛰草开愁晚，何用三郎鞞鼓催？”^⑦可见也是在酒酣之后作画。他要先使自己进入解衣盘礴的创作状态，任性情搏动，凭感情



图五 明 徐渭 花卉卷局部
28.3cm×375.6cm 纸本 水墨 上海市博物馆藏

激发，然后随手而至，出自家意。

徐渭不是一个隐逸之人。陶望龄说他“直”，袁宏道说他“有不可磨灭之气”。不管他的仕宦之路如何坎坷，境遇如何不济，他都是入世的。且不说青年时八次参加乡试，想博取功名、为世所用；中年时先后入胡宗宪、吴兑幕府，参加和关注抗倭斗争、边境防御；直到73岁，即在他去世的那一年，他还对国家大事保持着极大的关心：他得知宁夏平叛和抗击日本倭寇进攻东南沿海即朝鲜的胜利后，即兴书《春兴》诗一首。加之才华不为世赏、时运不济，所以他和社会有着很强的冲突，胸怀一种愤激之情；他拜王守仁的弟子季本为师，深受心学的影响，冲破理学思想的束缚，“中也者，人之情也”，主张最大限度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贱相色，贵本色”，强调真性情。所以他的作品，是豪放痛快、泼辣直率的，是放逸的风格，和宋代以来温文尔雅的、平和冲淡

的文人画风格是不相类的，更不是纤细文弱的。文人画到他这里，发生了一个大转变。

这种放逸的风格，体现在对“不求形似求生韵”的写意性的强化上。徐渭认为，作画以“以墨汁淋漓，烟岚满纸，旷若无天，密如无地为上。”^⑧“画病不病，不在墨重与轻。在生动不生动耳。”^⑨他写竹，“略形似，只取笔底潇潇意”；画蟹，“虽云似蟹不甚似，若云非蟹却亦非”。我们看他笔下的葡萄，果实不追求饱满圆润，信笔点来，大小不一，多少不定；葡萄串间的细梗时连时不连；墨叶连成一整片，叶脉或勾或不勾，仿佛影影绰绰地堆叠在一起。

徐渭的确在追求这种“影”的效果。他说“万物贵取影”；夏圭的山水让人“舍形而悦影”。之所以如此，还是前文提及的“梅花馆”那架葡萄。傍晚日落之时，黄昏的余晖映照，望中葡萄

枝叶果实皆为暗影，而果实形态毕具。所以，徐渭画葡萄，大都是一片墨影。说起对“影”的关注，早在五代时。传五代的李夫人，夜坐床头，见竹影婆娑映于窗纸上，乃循窗纸摹写，创墨竹法。而徐渭写“影”，理念更为深入：“影”不是具体的形，是他的主观精神与客体事物在他的感知中相互作用的产物。“影”既不是客体形象，也不是纯粹主观的东西。他在艺术中所描绘的，正是这样的东西。这既是遗貌取神，又是艺术家独特的艺术创造。

他要怎样来描画葡萄形象呢？以草书入画。“想下笔时，天地为之低昂，虬龙失其夭矫，大似张旭、怀素草书得意时也。”^⑩毛笔在他的手中，如丈八蛇矛，挥舞纵横，极放荡之致，真是前无古人。我们看他葡萄枝干的运笔，奔放酣畅，如疾风骤雨般，笔意连续，一气呵成；就算是用较小的笔触画的葡萄柄、小葡萄、小叶片，也是有很强的力



图七 明 徐渭 四时花卉卷局部之一
32.5cm×795.5cm 纸本 水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八 明 徐渭 四时花卉卷局部之二
32.5×795.5cm 纸本 水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量感和激烈的运动感，仿佛惊蛇入草、渴骥奔泉。尤其是图二、图九，无论画枝干、刷叶、点葡萄、勾细蔓，行笔皆狂扫奔走，满纸飒飒风动，扑面而来；气魄生动，震撼人心。张岱评他“离奇超脱，苍劲中姿媚跃出，与其书法奇崛略同。……余亦谓青藤之画，画中有书。”^⑩显然，他就是将书与画结合在一起。倪瓚的画逸笔草草，他是以行书笔意入画；而徐渭擅长草书，他作画多狂草笔势。他是自觉地将草书的笔法引入绘画的。他说“迨草书盛行，乃始有写意画”^⑪；他画水仙是“张颠狂草笔，图罢一高歌”；他承认他画的尺鳞，不过是张癫狂草书。

徐渭的放逸，还体现在用墨上。他对水墨的运用，丰富多样、极具变化。尤其善运大泼墨、大破墨、积墨。墨笔横扫，一倾于纸面。在画葡萄叶子时，他先是用笔饱蘸墨汁，以泼墨为之。然后再以浓破淡，或为了表现前后层层叠叠的叶子，采用积墨法分几层墨色画出，让人感觉到重叠而繁茂。徐渭曾评价其友陈鹤的花卉：“滃然而云，莹然而雨，炫炫然而露也，殆所谓陶之变耶！”^⑫他自己的水墨运用也多具有这种效果。

一幅墨葡萄完成了，那灵越跳动的

叶，如抛掷似跳动的果实，屈伸盘结而扭动坚劲的枝干——那是一株充满生命力的葡萄树。徐渭还意犹未尽，他审视一下画面，在他认为合适的地方，以重墨题诗一首。那充满神韵的形象、那奇崛的书法、那不输李贺的诗文，就这样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说他是在墨中游戏，却把我们领入了率性天真、激情洋溢、豪放泼辣的艺术天地，那浩然之气深深打动了我们。

徐渭独立在晚风中发出长啸，他那如鹤唳一般的长啸，不知道能不能得到鹤的回应。他茕茕孑立、悲情长啸的形象一直留存在后人的印象中。清代阮元在《重修青藤书屋记》中说：

“先生为明一代才人，受知于大府胡公宗宪，礼遇之隆，一时无俦。遇事后，张公元忬知之，尔后陶公望龄知之，袁公宏道又知之，先生虽不遇，可以无憾。”紧随其后，八大山人、石涛、郑板桥、李颀、吴昌硕、齐白石，这些美术史上的赫赫大家，都知对他顶礼膜拜，徐渭可以无憾！他所泼下的“明珠”，也一直为人们所喜，发出越来越璀璨的光辉。

注释：

①《徐渭集》第四册《补编》，《理葡萄

诗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97页

②《葡萄》，《徐渭集》，第400-401页

③陶望龄曾评价徐渭说：“越之文士著名者，前惟陆务观，后则文长。”见陶望龄《徐文长传》，《徐渭集》附录，第1339-1341页

④见冯其庸《徐渭的书画艺术》

⑤袁宏道《徐文长传》，《徐渭集》附录，第1342-1344页

⑥同6

⑦《又图卉应史甥之索》，《徐渭集》，第154-155页

⑧《与两画史》，《徐文长三集》卷十六

⑨《书谢叟时臣渊明卷为葛公旦》，《徐文长三集》卷二十

⑩《缶庐诗别存·葡萄》，转引自李德仁《徐渭》附录五，第434页

⑪张岱《琅嬛文集·跋青藤小品画》，转引自李德仁《徐渭》附录五，第427-428页

⑫《徐文长三集》卷二十《书八渊明卷后》

⑬《徐文长三集》卷二十《书陈山人九皋氏三卉后》

“文化黄河”在北京通州大运河畔传递大河回响

文 / 杨 飒 黄 丹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文明的摇篮与民族精神的象征。她奔腾不息，历经千年风雨，孕育了华夏大地的历史记忆与思想根脉。而大运河，则是人类智慧的伟大创造，其贯通南北、沟通百业，还在漫长的岁月中改变了环境，塑造了风土人情，沉淀了思想与记忆。

初秋是北京通州，大运河畔水波粼粼。中国民族文化艺术基金会“文化黄河”推广大使孔敬走进北京通州大运河，用脚步丈量古老水脉，用心灵感受文明回响。

孔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黄河是民族的根，大运河是文明的路。通州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以大运河为脉，



中国民族文化艺术基金会文化黄河推广大使 孔敬



依托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



源远流长



大家在河边散着步

正在把历史文脉与现代城市发展紧密结合。这不仅是对文化的守护，更是对未来的展望。”

在大运河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的景象令人心旷神怡。林木葱茏，鸟群翱翔，步道上，市民散步、骑行，孩子们追逐嬉戏，人与自然在此和谐共生。生态修复的成果与市民生活紧密相连，成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生动写照。

循河而行，燃灯佛舍利塔巍然矗立。它见证了漕运的繁盛，也铭刻着文明的厚重。夕阳下，塔影与河水同长；夜色中，灯火点亮千年守望。这座古塔不仅是通州的地标，更是大运河文化生命力的象征。

“时尚大河”，正在通州书写新的故事。大运河畔的张家湾设计小镇，如今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文化创意新地标。这里既承载着运河留下的历史印记，又汇聚着当代设计的青春活力。青年设计师们在展馆与工作坊中挥洒灵感，把传统文化符号转化为现代时尚语言，让古老文脉在当下焕发出新的光彩。

大运河文化继承并发展了黄河文化，延续了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孔敬表示，“文化黄河”公益项目将继续以河流为纽带，串联起更多的文化记忆，让“团结务实、开拓创新”的大河精神成为新时代的鲜明标志。“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认识到，大河不仅是一条水脉，更是一条文脉，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航道。”

河流在这里流淌，文明在这里回响。从燃灯塔的千年守望，到张家湾的创意新生，大运河的故事正在新时代的北京通州焕发新的生机。历史与未来在此交汇，中华文明的奔腾不息，在新的征程上书写着更加辽阔的篇章。（本文选自新华网 记者 杨飒 通讯员 黄丹）